

同為「改造」，各自表述—— 殖民地臺灣商業女性雜誌《婦人 與家庭》的誕生及其女性論述 (1919-1920)

顏杏如*

本文探討 1919 年底在殖民地臺灣誕生的女性雜誌《婦人與家庭》，其創刊的背景、性質與女性論述，同時，關注雜誌作為媒體亦為商品的面向，以及發行者與撰稿者所串聯的社會網絡對雜誌帶來的影響。《婦人與家庭》在高喊「婦人覺醒」的時代潮流中創刊，但實與日本女性商業雜誌在殖民地閱讀市場的穩定成長密切相關。受到一次世界大戰後時代潮流的影響，雜誌中雖充滿「改造」等流行語，但撰稿者所言的「改造」卻因身分立場而異，靠近「新女性」的論述與官方的「賢妻良母」在雜誌上並陳、攻防；讀者的投稿則一方面覆述了雜誌上的論調，一方面又展現了女性自身面對新時代的意志與行動力。作為第一部殖民地誕生的女性商業雜誌，《婦人與家庭》顯示了殖民統治、時代潮流與印刷商業資本交錯力量下，在臺日本知識人、官方教育界，以及具讀寫能力的少數日本女性們，在雜誌上所交織而成的女性與社會、國家之關係，以及圍繞著女性的角力戰。

關鍵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女性雜誌、商業出版、賢妻良母、新女性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一、前言

1919年年底，一部在殖民地臺灣編輯、發行的女性月刊雜誌《婦人與家庭(婦人と家庭)》(1919-1925[?])誕生。1919年，是剛歷經動盪，吹著嶄新氣息的一年。一次世界大戰在前一年結束，戰後民族自決的風潮席捲全世界，殖民地展開民族解放運動。日本帝國也被迫應對、重組殖民地與日本本國之間的政治關係。除了政治環境的變動之外，同一時期也是民眾運動、女權運動蓬勃發展的時期。受到1917年俄國革命思想的影響，日本的勞動運動、農民運動、普選運動在大正民主昂揚中活潑地展開。自1910年代起，歐美婦女參政權運動的動向、女性論等，亦陸續被介紹到日本，並展開獨自的論述。1916年吉野作造(1878-1933)編著，評介西方各國「婦人問題」現狀的啓蒙書《婦人問題》出版，同年，中央公論社社長嶋中雄作(1887-1949)創辦的《婦人公論》發刊，這些由男性知識分子主導出版的啓蒙書、女性雜誌等，更推動了「婦人問題」顯著化。而後，雜誌上亦開始出現女性論客，1918年平塚雷鳥(1886-1971)在《婦人公論》上提出「母性保護論」，對此，與謝野晶子(1878-1942)以「經濟自立」，山川菊榮(1890-1980)以「社會主義」的觀點展開論爭。1919年底爭取女性參政權為三大目標之一的新婦人協會，也在「改造社會」的構想下開始籌組，1920年成立。¹以臺灣人為主體展開的政治社會運動，也在這樣的社會情勢中誕生。1920年7月《臺灣民報》的前身《臺灣青年》在東京創刊，「兩性間

¹ 金子幸子，《近代日本女性論の系譜》(東京：不二出版，1999)，頁103-144。米田佐代子，《平塚らいてう——近代日本のデモクラシーとジェンダー》(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頁128-149。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第27卷，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小学館，1976)，頁236-238。

的社會問題——婦人之解放要求」為其揭舉的課題之一，彭華英(1893-1968)亦提及新婦人協會的成立，開啟了臺灣人知識分子對於女性問題的討論。²

《婦人與家庭》的創刊時間稍早於《臺灣青年》，且不同於《臺灣青年》，發刊地點是在殖民地臺灣。在民主思潮湧現、民眾運動蓬勃、女權運動萌芽，高喊女性覺醒的新時代中，《婦人與家庭》是否以此為契機而發刊，抑或是在另一種社會情境中誕生？雜誌上的論述是否也是婦女解放運動的一環，抑或是對時代思潮的防堵？

《婦人與家庭》是一部少有研究者討論的女性雜誌。在楊翠關於臺灣婦女解放運動的研究中，曾略提及《婦人與家庭》，但視之為官方婦女團體所發行的雜誌。³然而，《婦人與家庭》在性質上迥異於《臺灣愛國婦人》(1908-1916)，並非由官方或女性團體所發行的機關誌，而是由出版社「臺灣子供世界社(臺灣兒童世界社)」所發行，可以說是殖民地臺灣第一部商業女性雜誌。⁴引人注意的是，《婦人與家庭》的創刊

² 參見：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頁 86-87。張志樺，〈當臺灣開始談戀愛——日治時期戀愛論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頁 42。

³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頁 58。

⁴ 吉川精馬，〈「婦人と家庭」發刊について〉，《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2-3。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的機關誌《臺灣愛國婦人》創刊於 1908 年，1916 年廢刊。關於愛國婦人會及其機關誌，詳見：洪郁如，〈日本殖民統治與婦人團體——試論 1904-1930 年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臺灣風物》，47:2(板橋，1997.6)，頁 53-71。吳明純，〈國策、機關誌與再現書寫——以《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愛國婦人》、《新建設》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雜誌依發行目的，可分為機關誌、商業誌、同人誌等等。機關誌指特定的團體或政黨等，為了宣傳其理念主張而發行的雜誌；同人誌為志同道合者，為

早於讀書市場臻於成熟並邁向大眾通俗的 1930 年代，⁵其出現具有何種意義？一般而言，商業雜誌的特色為大眾化，並具有娛樂性，《婦人與家庭》是否亦如是？若與同一時期日本女性雜誌的發展對照，又呈現何種特色？

另一方面，學校教育對女性的影響與國民意識的形塑，向來是研究者關注的主題。二戰前日本的女子教育以賢妻良母主義為核心，同時存在著強化國體觀與家族國家觀的意識型態，期待女性在家庭內支撐男性的活動，培養符合近代國家的「國民」。⁶在殖民地臺灣，殖民政府的政治權力和臺灣人家族利益的拉扯下，也催生了解纏足、接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⁷然而，學校教育外，在坊間流通的報章雜誌，

了發表作品、交換情報而共同編輯、發行的雜誌；商業誌是指以營利為目的所發行的雜誌。雜誌依內容之差異，又可分為文藝雜誌、專門雜誌、娛樂雜誌、兒童雜誌、婦女雜誌等等。關於雜誌的分類，參見：圖書館問題研究会圖書館用語委員會編，《圖書館用語辭典》（東京：角川書店，1982），頁 168-170、251。日本圖書館情報学会用語辭典編集委員會編，《圖書館情報學用語辭典（第 4 版）》（東京：丸善書店，2013），頁 168。

⁵ 藤井省三，《台灣文學この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頁 25-67。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 1930 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33：7（臺北，2004.12），頁 17-55。陳培豐，〈殖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伙〉·《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臺南，2009.10），頁 249-290。

⁶ 小山靜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東京：勁草書房，1991）。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名古屋：黎明書房，1998）。牟田和惠，《戰略としての家族——近代日本の国民国家形成と女性》（東京：新曜社，1996）。天野正子編著，《女子高等教育の座標》（東京：垣内出版，1986）。

⁷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此處所指的「新女性」，不同於日本 1910 年代出現的反抗家庭制度與賢妻良母主義的「新女性」，而是指解纏足、接受新式教育的臺灣人女性。

往往左右人們的認知、意識與行動。王琬葶曾運用《婦人與家庭》中刊登的小說，討論女性作家筆下的啟蒙信念和對自由的想像，指出雜誌中的女性創作者在日本女性解放思潮的湧動下，表達對既有家庭、社會性別結構的衝撞。行文中，《婦人與家庭》也被定位為「殖民地女性現代生活的指南及提供資源的窗口，揭示了提升女性社會地位、打造新女性的目標」。⁸不過，《婦人與家庭》果真是以「打造新女性」為目標嗎？所謂的「新女性」，是否是 1910 年代以平塚雷鳥和雜誌《青鞜》所象徵的「新女性」——對家族制度和賢妻良母主義反抗，嘗試打破加諸女性的束縛，追求自我？此外，在《婦人與家庭》上的撰文者，大多是男性。一次世界大戰後，身處「邊陲」的殖民地是否受到新思潮的影響，又如何回應來自帝國「中心」的波動，恐怕無法忽視同在雜誌上男性的論述，這也攸關如何理解《婦人與家庭》的性質、意圖，以及雜誌在該時代的定位與意義。

若將視野拉至女性雜誌之外，關於殖民地臺灣報章雜誌中的女性論述，楊翠以《臺灣民報》系列為對象，分析 1920 年到 1932 年之間臺灣人知識分子所展開的婦女解放言論。⁹張志樺則聚焦在「戀愛」論述的歷時性變化，並探討新舊知識分子之間在概念上的拉扯關係。¹⁰這些

⁸ 王琬葶，〈世界的聲響——日治時期臺灣女性雜誌的女性主義閱讀(1919-1939)〉，《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4(臺北，2014.6)，頁 37-75。王專注於文本的分析，並未深入討論《婦人與家庭》本身的發行背景。

⁹ 在民報上展開的言論主要以婚姻、經濟、女子教育與參政權問題為主。另外，楊翠指出《臺灣民報》揭舉三大解放目標——民族、階級、婦女，以及殖民地臺灣女性所受到的三重壓迫——殖民者、資本家、父權。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

¹⁰ 張志樺，〈當臺灣開始談戀愛〉。與本文相關的 1920 年代前後之討論，同樣以《臺灣民報》作為主要的分析對象，佐以《臺灣日日新報》作為言論場域交鋒的對照。

研究成果，揭示了以臺灣人為主體所展開的論述與實踐。相對於此，比《臺灣民報》的前身《臺灣青年》稍早創刊，在發行時間上亦有重疊的《婦人與家庭》，執筆者幾乎為日本人，代表了不同於臺灣人知識分子的論述，也衍生了不同的問題——其訴求的對象與內容的差異。當寫者與讀者以在臺日本人為主時，又對女性加諸何種規範與期待？換言之，《婦人與家庭》提供了不同的線索，讓我們可以從另一角度檢視日本帝國與殖民地社會雙重磁場中產生的女性論述。當 1920 年代，婚姻自主、教育平等、經濟獨立、女性參政權等圍繞著臺灣人女性的論述躍上《臺灣民報》系列之前，《婦人與家庭》中展開了什麼樣的論述，如何因應殖民地之需求？作為媒體，同時也是商品的雜誌，相對於女性個體的行動與實踐，又折射出何種女性群體與帝國、殖民地的關係？

上述這些問題，關乎以下兩個層面。一是商業雜誌作為媒體與商品的面向。這一層面牽涉了發行者、寫者，乃至消費的讀者大眾；發行者與創刊目的，以及預設的讀者眾，往往左右了作為商品的雜誌之內容與形貌。若思考雜誌的這項特性，首先必須探問，《婦人與家庭》在何種背景、情境下發刊，創刊的目的為何，發行者、執筆者、讀者是哪些人，如何影響雜誌的性質？這些問題也聯結了另一個層面，亦即，雜誌上所展開的論述及其意義。雜誌反映知識的社群與網絡，刊載的內容往往是時代脈絡與社會情境下，特定群體所關注的議題，並對預設的讀者群傳達。那麼，與《婦人與家庭》有關的特定群體——發行者、撰稿者，在雜誌上傳遞了何種女性觀？其內容如何試圖影響殖民地女性的集體心性？外部的世界思潮與內部的殖民結構如何左右論述的產生？讀者們又如何接受與回應，甚至參與雜誌的內容與樣貌？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等外部資料顯示，《婦人與家庭》至少發行至 1925 年，期間幾經轉手（詳見後述）。然而，

今尚存的雜誌為創刊號(1919年12月)到第二卷第十二號(1920年12月)，由「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共12冊，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¹¹由於1921-1925年的雜誌已散佚，故筆者以現存的1919-1920年分的雜誌為考察分析對象。這一階段的《婦人與家庭》標誌的恰是商業女性雜誌在殖民地臺灣發軔初期的樣態，同時，也反映了一次世界大戰後世界思潮變動下產生的衝擊與回應。

本文首先嘗試從雜誌的創辦關係者，檢視《婦人與家庭》的發行目的與性質。在釐清雜誌性質後，進而以雜誌中佔重要位置與篇幅的論說為分析對象，爬梳在雜誌上所展開的女性相關論述。最後，反向回到受眾，從有限的線索勾勒讀者的樣貌，及其與雜誌的關係。從發行者的背景、動機，執筆者的論述，到讀者與雜誌的互動參與，透過這些層層梳理，探問在日本帝國、殖民地臺灣，以及在國家與印刷商業資本中折射出的，對在臺日本女性的規範與期待，以及一次世界大戰後的1920年代初圍繞著女性的角力戰。

二、《婦人與家庭》的創刊與女性雜誌市場的萌芽

在目前關於日治時期雜誌發展的史料及研究中，大多依「內容」分類雜誌。¹²不過若觀察這些雜誌的發行者，不難發現1910年代之

¹¹ 第二卷第十號缺號，以出刊日期的延宕推測，並非該號佚失，而是未出刊。(因第二卷第九號出刊日為1920年10月，第二卷第十一號出刊日為1920年11月。)

¹² 如：裏川大無分為文藝、語學、美術、產業、社會科學、宗教等等，李明水則分為政治、經濟、教育、文藝等等類別。參見：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一)~(九)〉，《臺灣時報》，1935：2-12(臺北，1935.2-12)，頁134-140、頁101-106、頁104-108、頁116、頁118-127、頁110-116、頁

前，大部分的雜誌都是機關誌；也有一些同人誌，集中於文藝類；商業誌的數量微乎其微，1909年創刊的《實業之臺灣》是其一。1910年代以後到1920年代中葉，仍以機關誌和同人誌為主，其中，文藝類的同人誌顯著增加，商業誌則是緩慢成長。「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的《學友》、《婦人與家庭》即是此時新增的商業雜誌。在為數仍少的商業雜誌中，標示著婦人、家庭的雜誌何以在此時誕生？一般對商業雜誌的認識是娛樂性、大眾化，但《婦人與家庭》是否亦是如此？筆者試從雜誌的發行人、顧問之關心，以及雜誌本身的內容、構成等，考察《婦人與家庭》的特色與性質。

(一) 發行人吉川精馬(1889-1926)的關懷

1919年12月《婦人與家庭》創刊之際，發行人吉川精馬在發刊詞中如此陳述創辦雜誌的動機：

婦人與兒童相關的圖書刊行眾多，特別是近來此種新聞雜誌，更擴張其範圍，如雨後春筍般地增加。這在好的意義上、不好的意義上，都驗證了時代的需求，對這個社會而言，應看作是可喜的現象。當然，若在嚴格的意義上批評的話，雖仍是日本婦人的大多數，這樣的現象毋寧是悲慘過渡期時代的產物罷了，要說這顯示了我國婦人覺醒還言之過早。……女性比起男性不僅是遠遠的落後者，還沒有作為人的真正生命、極度無自覺、無定見、無反省、無智識……。

然而至少應培養現代婦人社會，乃至以小孩為中心的家庭，對這樣的責任和希望抱有憧憬，從每月刊行的眾多婦人雜誌逐年

140-144、頁 147-153、頁 120-124、頁 139-143。李明水，《臺灣雜誌事業發展史》(臺中：臺灣省政府，1986)。

凌駕其他出版物的趨勢可知其一斑，同時，不難推知其費心於如何使婦人或家庭，努力於自我覺醒，讓囿於因襲、形式的家庭生活，進一步改善。然而，這些婦人讀物都是以內地為中心。而我等居住臺灣的內地人，及本島人的家庭——對婦人小孩而言，自有不同山河風土的自然，生活樣式差異上，顯著的變化歧異之出發點，作為所謂新領土——亞熱帶國——臺灣的家庭讀物，實在不得不恨鞭長莫及。因此，我相信在殖民地，以殖民地為中心、為背景的特種婦人雜誌，或成為家庭之友的讀物，無論如何都有必要，不，不僅是我，識者前輩們也都這麼認為，並大聲疾呼。¹³(原文為日文，以下同。)

從吉川精馬的發刊詞可以窺見，《婦人與家庭》創刊之前，「婦人與兒童相關的雜誌」已擁有其市場，且不斷擴張，然而臺灣卻尚未有以「新領土」為中心，適合臺灣風土、生活樣式的婦人雜誌。另一方面，創辦雜誌，也是因應「時代需求」——如何使「還沒有作為人的真正生命」之婦人覺醒，如何改善「囿於因襲、形式的家庭生活」。換言之，吉川希望透過發行雜誌，趕上「婦人問題」的潮流。不過，對吉川來說，究竟「婦人問題」是其關懷的重點，抑或雜誌作為商品的事業版圖，才是其重點？

若追探吉川的背景可以發現，吉川原是醬油業起家，之後跨足出版業。¹⁴1916年創辦《臺灣日日寫真畫報》(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6-1918)；

¹³ 吉川精馬，〈「婦人と家庭」發刊について〉，頁2-3。

¹⁴ 吉川精馬，大分縣人，明治四十年(1907)渡臺，明治四十二年(1909)開始獨立營業。吉川除了本文正文中提到創辦多份雜誌之外，1921年他以《實業之臺灣》社長的身分，率隊至南洋拍攝活動寫真，向日本本土及臺灣介紹南洋，同時，也向居住南洋的日本人介紹臺灣現狀。他亦在《實業之臺灣》上發表多篇文章鼓吹日本人南進，1922年更出版《戰後南支南洋と臺灣》

1917年成立臺灣子供世界社，創辦以兒童為中心的雜誌《臺灣子供世界(臺灣兒童世界)》(1917-1925)¹⁵，1919年更發行以小、公學校四年以上為對象的姐妹誌《學友》(1919.1-1919.11)；1919年12月《學友》改題為《婦女與家庭》，其原本的內容則移入《臺灣子供世界》。臺灣子供世界社除了發行上述雜誌之外，也出版、印刷許多與教育相關的書籍、教科書與參考書。¹⁶1920年，吉川繼承1909年創刊的《實業之臺灣》，並擔任實業之臺灣社的編輯人、社長。¹⁷1922年更創辦《第一教育》(臺灣子供世界社，1922-1935)。¹⁸

一書，介紹南洋情勢及其見聞，以此力唱大和民族的南方發展，顯示其具有國權論者的樣貌。參見：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44。不著撰人，〈吉川精馬氏永眠〉，《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12月13日，(夕刊)第1版。吉川精馬，〈南進の機愈々熟す〉，《實業之臺灣》，13：8(臺北，1921.8)，頁12-13。吉川精馬，〈帝國の南方開發と臺灣〉，《實業之臺灣》，12：1(臺北，1921.12)，頁6-9。吉川精馬，《戰後南支南洋と臺灣》(臺北：實業之臺灣社出版部，1922)。

¹⁵ 在《臺灣總督府統計書》中可以看到，《臺灣子供世界》至少發刊至1925年。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四年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二十九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7)，頁112-116。

¹⁶ 吉川精馬，〈「婦人と家庭」發刊について〉，頁2-3。另參見：游佩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頁167-185。關於吉川精馬所創辦、或擔任發行人的雜誌，游佩芸有詳細的整理，不過受限於游當時所運用的史料，一些雜誌的創刊年與停刊年有誤。筆者參照游佩芸的研究，並依據筆者所見之現存一手史料重新整理。又，「臺灣子供世界社」出版的書籍、教科書、參考書等為數眾多，僅就國立臺灣圖書館就有一百多筆館藏(館藏查詢系統，<http://cis2.ntl.edu.tw/webpac/>，擷取日期：2020年3月10日)。該社在教育界扮演的角色，以及與國語教育之間的關係，已超出本文討論的範圍，留待未來相關研究者的探討。

¹⁷ 1909年《實業之臺灣》創刊之時的發行人為田中一二(1885-?)，之後改為德木正風。參見：《實業之臺灣》，臺北：實業之臺灣社，1909-1925。

¹⁸ 國立臺灣圖書館現存最早的《第一教育》為1924年第三卷第六期，因此推

這些經歷說明，吉川精馬在 1916 年以後創辦多部報刊雜誌，在當時商業雜誌仍為數不多的狀況下，在媒體界占有一席之地，而其創辦的雜誌大半與兒童、家庭有關。筆者推測吉川成立子供世界社、創辦與兒童相關的雜誌，應與此一時期童話講演的推展，以及報刊雜誌業的發展有關。1916 年童話界大家巖谷小波(1870-1933)首次訪臺，其間，臺灣的講演童話界也成立了「臺灣お伽會(臺灣童話會)」。¹⁹臺灣子供世界社的成立正是巖谷小波訪臺的隔年，該社也曾主辦童話大會。²⁰事實上，《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第二期(大正五年八月下の卷)即已刊登童話小說(お伽小説)，足見童話講演風潮帶動的影響。²¹

另一方面，1910 年代後半，也是日本輸入的女性雜誌、幼少雜誌在殖民地臺灣穩定成長的時期。日本從明治十年代(1878-1887)開始，就已出現女性雜誌，不過此時主要為啟蒙誌，延續江戶時代家政書的系譜，在歐化的時代中以婦女改良為目標。明治二十年代(1888-1897)，除了啟蒙誌之外，特定團體、組織也創辦機關誌，從不同的立場主張女性的啟蒙、改良。同一時期，隨著都市化，以及女性初、中等教育日漸普

測創刊年為 1922 年。《第一教育》，3：6(臺北，1924)，頁 104(版權頁)。

¹⁹ 巖谷小波為「日本童話界」三大家之一，1896 年曾在京都講演童話，1898 年以後更為學習院幼稚園的兒童講演自創的童話故事，1908 年作為《少女世界》、《少年世界》的主筆，為了雜誌宣傳而至日本各地巡演。童話的講演在 1910 年代後半至 1920 年代前半更進入高峰，日本各地都有童話研究會，兒童文化團體亦常舉辦童話大會。游佩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頁 36-45。

²⁰ 記者，〈臺灣子供世界社主催 お伽大會の記〉，《學友》，1：11(臺北，1919.11)，頁 12-13。

²¹ 羽賀銀松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大正五年八月上の卷》(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6.8)。羽賀銀松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大正五年八月下の卷》(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6.9)。

及，商業女性雜誌出現。不過，一般認為，《婦人公論》、《主婦之友》創刊的 1910 年代後半，才進入商業女性雜誌發展的隆盛期。²²一次世界大戰前後，日本資本主義體制確立，女性勞動者不斷增加，加上女子教育普及，創造了女性雜誌得以商品化、大眾化的條件。²³這一段時間登場的《主婦之友》(1917 年由東京家政會[後改為主婦之友會]創刊)、《婦人俱樂部》(1920 年由大日本雄辯會創刊)，與此前的女性雜誌(如《女學雜誌》[1882]、《女學世界》[1901]、《婦人世界》[1906]、《婦人之友》[1908])相較，其啟蒙性、科學進步性、道德文化性都相對淡薄。1920 年代中期以後，《婦人世界》、《婦女界》因大眾化失敗而沒落，市場幾乎由《主婦之友》、《婦人俱樂部》所獨占。²⁴這些女性雜誌也輸入殖民地臺灣，在閱讀市場占有一席之地。1900 年代初，記者橋本白水觀察到，臺北唯二販賣新刊書籍雜誌的博文堂與新高堂，最受歡迎的雜誌依序為《太陽》、《文藝俱樂部》、《新小說》、《女學世界》、《婦人界》，此外，婦人家庭、料理相關之新刊書籍為數不少。²⁵白水的觀察顯示女性讀物在 1900 年代初開始展露頭角，而後，女性雜誌的市場更逐漸擴張。根據 1909 年的調查，「內地雜誌」銷售最佳的前三名是《婦人世界》、《實業之日本》、《女學世界》，到了 1920 年代中期，輸入最多的則

22 關於明治時期日本女性雜誌的發展軌跡，參見：三鬼浩子，〈明治の婦人雜誌をたどる〉，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編，《婦人雜誌の夜明け》(東京：大空社，1989 初版；2016 新裝普及版)，頁 3-102。

23 永嶺重敏，《雜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頁 162-188。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国民大衆雜誌の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2)，頁 28-29。

24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頁 28-29。

25 白水，〈臺北の讀書界(下)〉，《臺灣日日新報》，1903 年 4 月 12 日，第 3 版。

是婦人雜誌和少年雜誌。²⁶

1917年《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指出幼少雜誌銷售量遽增，並推測其原因為總督府圖書館兒童室開館及巖谷來台，帶動在臺日人家庭對兒童教育的重視；另一方面，婦人雜誌的購讀者持續增加，而《臺灣愛國婦人》去年廢刊，更讓婦人雜誌充滿開拓的餘地。²⁷臺灣子供世界社的成立與《臺灣子供世界》、《婦人與家庭》的發行，恰為這段時期，與報導中所揭示的殖民地內部因素密切相關，從日本帝國的空間來看，日本輸入雜誌帶來的商業上的刺激更不容小覷。以《學友》、《婦人與家庭》創刊的1919年而言，《臺灣日日新報》上可以看到日本輸入的《少女之友》、《幼年之友》、《少年世界》、《少女世界》、《少年》、《少女》、《女學世界》等雜誌的廣告，《學友》在定價時，清楚地意識到日本輸入雜誌的競爭。²⁸上述諸多現象說明，1900年代起日本商業雜誌已將銷售版圖擴張至殖民地，而1910年代後半穩定成長的婦女雜誌市場，是觸發殖民地臺灣商業女性雜誌創刊的重要背景。若回頭檢視《婦人與家庭》的發刊辭，也清楚地顯示這一點——「每月刊行的眾多婦人雜誌逐年凌駕其他的出版物」，而這些「眾多婦人雜誌」都自日本輸入。1921年吉川在〈可大大善用新聞雜誌〉一文中，明白提到《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等付費報紙動輒數十萬的發賣部數及其龐大的購讀者。²⁹事實上，作為一名商人，吉川早在1910年代中期便已預見報章

26 李承機，〈台灣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說——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4），頁252-253。

27 不著撰人，〈臺灣の讀書界〉，《臺灣日日新報》，1917年2月27日，第4版。

28 游佩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頁178-179。

29 吉川精馬，〈大に新聞雜誌を善用す可し〉，《實業之臺灣》，13：2（臺北，1921.2），頁4-5。後文則論及政治應善用民眾之力、輿論之聲。

雜誌之閱讀市場。

1916年創刊的《臺灣日日寫真畫報》上的一些線索，顯示吉川在此時已意識到兒童、家庭的娛樂需求，以及報刊雜誌業發展的可能性。在創刊號(八月上之卷)上刊有臺北圖書館(總督府圖書館)兒童室開館的照片，並寫道入場者極多，是「少年少女的樂園」。此外，吉川在版權頁將該畫報定位為「家庭讀物」，並說明創刊的緣由：殖民地臺灣欠缺家庭趣味娛樂，希望畫報能彌補此一不足，作為家庭良伴，兼顧趣味與實用。之後，畫報從每月發行兩次，到每月發行一次，也逐漸從「寫真畫報」的日誌形式，發展成雜誌的冊型。刊登內容主要以在臺日本人社會為主體，包含從官到民，從家庭到社會大大小小的各種動向，亦不乏家族團圓、女性社群活動照。³⁰吉川對兒童、女性與家庭的關心，以及之後創辦出版社，發行雜誌的企圖心，在此時已出現雛形。

綜觀上述，儘管《婦人與家庭》是在一次世界大戰後「婦人覺醒」的風潮中出現，但在創辦人吉川精馬的意識中，其女性觀遠遠落在1910年代以青鞞社為中心的「新女性」論述之後，其「婦人覺醒」乃是將女性與兒童教育、家庭生活放在同一範疇中思考，這一點也顯示在其發刊詞及刊名《婦人與家庭》上。換言之，其「婦人覺醒」不同於反抗家族制度、追求自我的「新女性」論述，與其說是為了宣揚「婦人覺醒」而發刊，不如說在這一點上僅是乘著新時代的風潮，真正推動雜誌誕生的磁場，是女性商業雜誌在殖民地閱讀市場的成長。

30 羽賀銀松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大正五年八月上之卷》(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6.8)。吉川精馬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第二年第七號》(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7.7)。吉川精馬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新年號》(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8.1)。

(二) 顧問小島草光的女性觀與人際網絡

《婦人與家庭》創辦之時，吉川精馬邀請當時在《臺灣新聞》撰寫「婦人與社會」專欄的小島草光擔任顧問。小島於 1919 年夏來臺，渡臺前，曾在朝鮮、日本山陰地方舉辦過「傳說和婦人問題」等演講會，也與日本關心婦人議題的有志之士交遊往來。1920 年 9 月更將發表在「婦人與社會」專欄中的文章，以及在朝鮮、東京、山陰各地新聞社任職時所撰寫的文章集結成《為了婦人(婦人の為に)》一書。³¹該書出版時，隈本繁吉(1873-1952, 臺北高等商業學校長)、古山榮三郎(1870-?, 臺灣總督府編修官)曾為小島作序，原口竹次郎(1882-?, 前早稻田大學教授、時為臺灣總督府調查課係長)為之作跋，透露小島身處的人際網絡與官方教育者密切關聯。³²

綜觀小島在《婦人與家庭》上發表的文章，其所關心的，與其說是婦女問題，不如說是兒童問題。關於女性問題的論述，多集中在家庭、兒童教育，主張「家庭的民本主義」、「兒童中心本位主

31 小島草光，〈本誌關係の動機と私の婦人概観〉，《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82-84。本間生，〈男女教育平等論 女子教育茶話會にて〉，《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57-59。〈近刊豫告〉，《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77。小島草光，《婦人の為に》(臺北：臺灣圖書刊行會，1920)。

32 小島草光，《婦人の為に》。〈近刊豫告〉，頁 77。

義」等。³³僅有少數文章與生活改造、女性的海外勞動有關。³⁴1910年代後半，「新教育運動」從西方傳入日本，強調以兒童為中心，讓兒童個性自由發展、尊重其主體性等，並在教育方式上展開各種嘗試。這些嘗試是在國家統制的框架外依循自身的理念而展開，也是對國家主義教育進行一定程度的修正。³⁵小島的「兒童中心本位主義」等理念，應是受到在日本展開的新教育運動之影響。

另一方面，小島在《婦人與家庭》中並未撰寫與「新女性」議題相關的文章。儘管從小島的撰文中可以得知他擁有「女性具獨立人格」、「女人不是物品」等觀念，但這些都不是其論述的重點。關於小島的女性觀，倒可以透過《為了婦人》一窺其貌。小島在該書第一編「婦人和社會生活」中的第一篇文章〈殖民地的內地婦人〉，起始便寫道，原以為居住殖民地的婦人，擁有前所未有的自由，可以發揮自己的個性、

³³ 小島草光，〈大人本位の家庭から子供本位の家庭——子供を天性の儘に發育せしめよ〉，《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4-7；〈就學前の子供を持てる母親へ〉，《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2-5；〈子供は何うして育てる注意したい若木の將來に就て〉，《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6-9。

³⁴ 如，小島草光，〈最近感じた二三の事ども〉，《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2-6；〈服裝改善の根本方針に就て＝まづ婦人方の自覺に訴えたきこと〉，《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6-11；〈婦人方に讀んで頂きたい二問題〉，《婦人と家庭》，2：11(臺北，1920.11)，頁6-8；〈主婦の働きは何よりも先づ人間であれ〉，《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2-5。

³⁵ 順帶一提，新教育運動的嘗試，到了1920年代後半開始遭遇國家力量的壓制。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第27卷，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208-219。秋枝蕭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逸脱と回収——大正・昭和前期を中心に〉，收入奧田暁子編，《女と男の時空——日本女性史再考》(東京：藤原書店，2000)，頁451-480。

開拓新生活，創造理想的家庭，但實際上卻完全相反。他引用臺中廳長之言，認為殖民地婦人過著「怠惰放逸、無勤勉之念、無忍耐之德、無讀書觀念」、「毫無生命、毫無愛的家庭生活」；婦人會也只是做些廢物利用、自宅絞染法等「遠離生活的遊戲」，毫不在意時間與金錢的節約，甚至流行盛裝送迎等虛禮。小島寫道，在舉世都高喊著「女性解放」之時，他不禁對這種「虛空的女人(唯の女)」感到既憤怒且悲哀，這也是他著述《為了婦人》的緣由。³⁶有趣的是，臺中廳長所批評的怠惰奢侈之風，與當時「女性解放」的呼聲，其實是非常不同的脈絡——前者包含著期待勤勉、忍耐等傳統的儒教價值觀，後者則強調打破傳統家族制度的束縛、追求自我，然而，小島卻將它們併為一談。

在《為了婦人》一書中，小島的女性觀交雜了許多不同的脈絡。例如，他贊成女性的社會勞動，但另一方面，他仍認為治家是婦人的本務，且應建立在寬廣的基礎上——不只為了家或丈夫，而是為了「國家社會」。³⁷對於殖民地的日本女性，他提醒作為「內助者」的婦人應在「旗日」懸掛國旗，因為這攸關「日本婦人的體面」，是「國民性情的發揮，也是萬國無比之新國體的光輝」。³⁸這些觀點顯示小島不斷將女性編入國家、日本帝國的射程中。但另一方面，他對當時島村抱月(1871-1918)與松井須磨子(1886-1919)飽受批評的不倫之戀，則跳脫道德論，盛讚島村是美善的人格者，甚至認為兩人是「非常美的戀愛」、「不能與普通一般的戀愛問題等同視之」，事件之所以以悲慘收場，是「過去非真愛的婚姻所造成」、是「社會的罪惡」。³⁹這個看似非常前

36 小島草光，〈植民地の内地婦人〉，《婦人の為に》，頁 1-5。

37 小島草光，〈祭日と國旗〉，《婦人の為に》，頁 30-34。

38 小島草光，〈打破すべく婦人觀〉，《婦人の為に》，頁 5-7。

39 小島草光，〈結婚と悲劇〉，《婦人の為に》，頁 7-18。

衛的論述，其實是基於反對非自由戀愛的婚姻而來。另外，小島主張讓女性從廚房解放以獲得自由，並指出可能的實現方式是安部磯雄(1865-1949)所說的「食物配達的時代必將來臨」，或如其前輩實驗中的勞動者食堂般，讓中流以下的家庭廢止廚房，改在公共食堂用餐。⁴⁰但這進步的女子解放論，背後關乎家庭的合理化與效率的提升。對於 1910 年代在日本社會中被視為品行不良的「新女性」，小島則持開放態度，認為應在時代中抱持著理解，「容其應容者，拒其應拒者」，才能看見婦人的進步與社會的進步。⁴¹書中亦介紹 1910 年代「喧囂一時的『新女性』」平塚雷鳥向第四十二回帝國議會(1919)提出對花柳病者的結婚限制請願，小島行文論及男性的責任觀念之缺乏、傳染病的潛在威脅，並強調婦女權利的擁護與自覺。⁴²換言之，小島對於「新女性」的態度相對是開放的，對 1919 年女權運動者所提出的主張亦持肯定的觀點。

《為了婦人》的內容透露小島的思想同時容納了官方教育者的賢妻良母論與女權運動者的主張。一些看似十分前衛的論調，確有吸收最新論說之處，卻又不脫當時關於兩性關係最基礎的論調，並且時而與官方的賢妻良母論結合，可謂極其多元且新舊雜陳，卻又合理地相互連結——女性的解放與效率的提升、國家意識的結合互為表裏；女性的覺醒、男性的責任也攸關了下一代的健康。但無疑地，小島的女性論述，比吉川稍稍靠近打破傳統框架的那一端，這也顯現在命名上——當吉川為雜誌命名為《婦人與家庭》時，小島在《臺灣新聞》上的專欄名為「婦人與社會」。

40 小島草光，〈食物問題〉，《婦人の為に》，頁 39-43。

41 小島草光，〈婦人の進歩と理解力〉，《婦人の為に》，頁 195-197。

42 小島草光，〈結婚に証明書が要る〉，《婦人の為に》，頁 100-103。

(三) 作為一本商業雜誌：《婦人與家庭》的構成與特色

關心兒童、家庭娛樂，將雜誌出版當作事業版圖的吉川精馬，加上與官方教育界往來密切，同時關心最新婦人論述與動向的記者小島草光合作之下，《婦人與家庭》出現何種面貌？

《婦人與家庭》為月刊形式，每號約 90 頁，自第二卷第六號以後頁數漸減至 80 頁左右，後更減至 70 頁上下。每部定價 30 錢，採「前金」制，亦即須先付款，並另外負擔一錢的郵資後收到雜誌，亦可長期訂閱。這樣的定價和當時日本輸入的婦女雜誌相同，若長期訂閱更較之低廉。⁴³雜誌在目次和內容上並沒有明顯的專欄設計，標題下方有時會標示文章性質，如「繪畫小說」、「寫真小說」、「長篇小說」、「短篇小說」、「讀者論壇」、「婦人論壇」、「短歌」、「本島童話」、「家庭笑話」、「才媛歌壇」等等，但名稱與出現的狀況並不穩定。雜誌內容為日文，不過，自第二卷第四號到第二卷第十號設有 7 到 10 頁左右的「漢文欄」，內容多為前號論說文的漢譯，顯示雜誌意圖將讀者群拓展至臺灣人。每號雜誌的卷首刊有照片，通常為官員家庭照，上至總督下至地方官、學校校長等等，呈現一幅圓滿的家庭圖像。有時亦有個別的官夫人、名流夫人玉照；篤志看護婦人會、婦人送別會、名刺交換會等以女性為主的聚會、活動照；修學旅行、女學生服裝、畢業生等，與女學校、女學生相關之圖像。以創刊號為例，卷頭照片刊登著總督田健治郎(1855-1930)、行政長官下村宏(1875-1957)、總督府編修官古

⁴³ 《婦人與家庭》半年的訂閱金為 1 圓 80 錢，一年為 3 圓 50 錢，皆含郵資。日本輸入的《婦人之友》每部定價亦為 30 錢，半年訂閱金為 1 圓 90 錢，一年為 3 圓 70 錢。《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87(版權頁)。《婦人之友》，13：12(東京，1919.12)，頁 144(版權頁)。

山榮三郎、臺北高等女學校校長秋吉音治(1865?-1937)的家庭照，此外還有官夫人合照，隈本繁吉夫婦與小島草光的合照等等。儘管《婦人與家庭》是一部商業雜誌，也試圖吸引女性的目光，卻散發著總督府官方的濃厚色彩，同時也透露以顧問小島草光為中心所延伸的人際網絡。

目次之後，佔雜誌重要版面的，是數篇論說文，之後則穿插著知名、不知名作者的論說，如「讀者論壇」、「婦女論壇」等等。這些論說、論壇的議題內容橫跨婚姻戀愛、性教育、女子教育、生活改造(包含服裝改良、家庭生活、閱讀、教養)、職業問題、女性特質。其中，得以辨識的作者，往往是官方教育界的人物。以創刊號為例，包含了太田秀穗(臺北師範學校校長)、秋吉音治(臺北高等女學校校長)、水田光子(東京高等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訓導)、古山榮三郎(臺灣總督府編輯官文學士)、平塚佐吉(臺北師範學校附屬小學校主事)。這一串名單，再次顯示《婦人與家庭》和官方教育界的密切關係。⁴⁴

一般而言，日本大正時期的商業女性雜誌，為了獲得廣大的讀者，往往帶有些微的啓蒙主義，以及強烈的商業主義。雜誌內容通常包含在時代變動中讀者關心的議題，並加上許多能引起讀者興趣的主題，如戀愛問題、告白記事、產兒調節的方法、家計、疾病治療、和洋裁、美容等家庭實用記事、小說等。⁴⁵若檢視《婦人與家庭》的構成內容，會發現也帶有這樣的性質。雜誌中穿插著具有娛樂、慰安成分的繪畫小說、名夫人訪問記、童話、長篇小說、詩歌，以及少數醫學知識、家事技巧、日常物品採購法、市場狀態等，但整體而言佔雜誌篇幅的

44 〈目次〉，《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無頁碼。

45 三鬼浩子，〈大正期の女性雜誌——働く女の機関誌を中心に〉，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會，《大正期の女性雜誌》(東京：大空社，1996初版；2016新裝普及版)，頁3-53。

比例遠較日本輸入的《主婦之友》這類大眾化雜誌為低。儘管內容看似琳琅滿目，但整體而言，論說文的篇幅佔雜誌內容的比例極高。不同於日本女性商業雜誌，《婦人與家庭》中疾病治療、和洋裁、美容等家庭實用記事極少，甚至沒有和洋裁、美容等專欄，只有偶爾介紹流行界的簡單訊息。作為一本商業雜誌，其議題取向的啓蒙性、論述性，遠遠超過能吸引讀者的娛樂性、實用性。這樣的性質，也顯示了商業性女性雜誌在殖民地臺灣初萌芽、尚在摸索的樣態——一方面承襲了嶋中雄作《婦人公論》(1916 創刊)這類由男性知識分子主導，具啓蒙性雜誌的路線，另一方面又受到以《主婦之友》(1917 創刊)為代表的大眾化商業雜誌之影響。將雜誌當作商品的發行人吉川精馬，以及關心女性議題的顧問小島草光，也分別對應了這兩條路線，影響了雜誌的樣貌。

《婦人與家庭》至今仍留存的雜誌，從 1919 年 12 月創刊號到 1920 年 12 月的第二卷第十二號，皆由撫臺街的「臺灣子供世界社」發行。之後確切的發行狀況不明，但從《臺灣日日新報》上一些片斷的資料可知，1922 年《婦人與家庭》已改由「婦人與家庭社(婦人と家庭社)」發行(社址歷經城南街、北門町、明石町)，1923 年下半年經營者再次由田淵秋汀轉至渡邊義孝，發行者則為「西爾維亞社(シルビヤ社)」(下奎府町)，1924 年之後則由「地蹈社」發行(社址原為下奎府町，1925 年遷至建成町)，經營者同為渡邊義孝。直到 1925 年 11 月都還可以在《臺灣日日新報》的〈新刊介紹〉上看到《婦人與家庭》的內容簡介。⁴⁶在《臺

46 〈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3 月 15 日，第 3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2 年 12 月 24 日，第 10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4 月 29 日，第 8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8 月 19 日，第 6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3 年 9 月 22 日，第 8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

灣總督府統計書》中亦可以看到《婦人與家庭》自 1920 年到 1924 年的發行人數，分別為 60,000、19,851、18,004、7,890、7,838。⁴⁷這些線索顯示，雜誌一直出刊至少至 1925 年 11 月。

統計書上發行量的數字在當時具有什麼樣的意義？1934 年以前，《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的發行人數統計，是以年發行人數計算，而非單次的發行人數，因此發行次數影響統計書上所呈現的數字。不清楚從 1920 年到 1921 年發行人數驟減三分之一是否與雜誌發行不穩定、欠號有關，但整體而言，可以看到發行人數不斷下滑的趨勢。這恐怕也與《婦人與家庭》之後不斷轉手經營、屢遷社址有關。但僅就現存 1920 年分的雜誌來看，《婦人與家庭》居同年度「雜誌」類發行人數之冠，《臺灣子供世界》(59,500)緊追其後。若將被歸在「新聞紙」，同為月刊的雜誌一併考慮的話，《婦人與家庭》亦僅次於《臺灣警察協會雜誌》(99,540)，高於《臺灣統計協會雜誌》(53,928)、《臺灣時報》(42,928)等官方、學術社團發行的雜誌。另外，《婦人與家庭》該年共發刊 11 次，因此平均每期雜誌發刊量約為 5,455 冊，可謂相當可觀。

1924 年 1 月 14 日，第 4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4 年 4 月 13 日，第 10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9 月 2 日，第 3 版。〈新刊紹介〉，《臺灣日日新報》，1925 年 11 月 15 日，第 3 版。

⁴⁷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四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2)，頁 126-13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五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3)，頁 118-123。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一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4)，頁 100-105。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七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5)，頁 100-107。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八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6)，頁 106-111。

三、迎向「新時代」

在釐清雜誌的創刊背景、目的與性質後，筆者接下來將焦點放在雜誌中篇幅比例極高的論說。這是由於論說在《婦人與家庭》中佔比之重成為該雜誌的特色之外，更因為論說往往具有清楚強烈的意圖，透過明確的主張，意欲改變社會前進的方向。因此，雜誌論說的分析，可以說是認識一份雜誌最基本的考察，得以釐清該雜誌欲對社會產生的影響。以下嘗試梳理雜誌上出現的各種論述所呈現的類型與光譜，檢視其如何回應時代的變化，背後流露的女性觀，意欲形塑何種理想的女性？在論述中呈現了何種女性與社會、國家的連結，又與當時的思潮之間存在著何種關係？

(一) 創刊號中的女性論述：基於「平等」的「改造」

在歷經一次世界大戰後各式思潮出現的時代背景中，1919 年底在殖民地臺灣誕生的《婦人與家庭》也同樣透露時代變動的氣息，除了字裡行間不時出現「婦人問題」、「婦人覺醒」等詞彙之外，也飄著大正民主時期「新時代」的色彩。1916 年東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在《中央公論》上發表〈論憲政之本義及其貫徹之道(憲政の本義を説いて其有終の美を済すの途を論ず)〉一文，展開「民本主義」的論述，並風靡一時。⁴⁸1918

⁴⁸ 吉野認為，「憲政的根柢在於，政治上注重一般民眾，民眾間不分貴賤上下之別」；民本主義乃指：政治的目的在於民眾的利益幸福，政策的決定應根據民眾意向。信夫清三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54)，頁 350-351。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第 27 卷，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 50。

年在米騷動後，同年 9 月立憲政友會總裁原敬(1856-1921)擔任總理大臣，組織內閣，這是日本憲政史上首次政黨內閣，沒有爵位的原敬被譽為「平民宰相」，受到國民歡迎，「平民」這個詞甚至成為流行語。⁴⁹這些日本本土政治、思想上的浪潮，其波紋亦在殖民地的雜誌上蕩漾。

在《婦人與家庭》的創刊號中可以看到，強調打破上下、階級關係的「平民」風氣，也被援用至解釋當時的家庭關係，以及圍繞著家庭的人際往來與行為舉措。小島草光批判過去的家庭是以父親、祖父等男性尊長為中心的「大人本位家庭」。他認為，最近流行的「民本主義」語彙，也必須運用於家庭，讓家庭從大人本位轉換至「兒童中心本位主義」。⁵⁰儘管小島在文章中，仍視育兒為家庭中女性的職責，但嘗試批判家父長制度下年長男性的權威，以及帶入「民本主義」的語彙，重新解釋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與兒童教育的方法，顯示新的政治風潮被運用在家庭教育、兩性關係上。臺北師範學校校長太田秀穗則為文批判「日本人習慣上下相服從，不習慣平面的、同等態度的交往」，認為殖民地婦人不應依憑丈夫的身分、職位高低，「對上對下都不高傲」；不應「太過度地說洋語、談帝展」、歧視無教育者。他甚至主張「應該要讓兒童盡量接受平民教育」，因為「現在，陸軍大將的小孩成為公司的僱員，總理大臣的小孩當二等兵，是當然之事」。⁵¹文中不斷強調打破階級界線、上下關係，強調「平民」的獨立精神，「平民風氣」也延伸至婦女們的交際往來與兒童教育的方針。

49 金原左門，《大正期の政党と国民——原敬内閣下の政治過程》(東京：塙書房，1973)，頁 92-106。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第 27 卷，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 171-174。

50 小島草光，〈大人本位の家庭から子供本位の家庭〉，頁 4-7。

51 太田秀穗，〈殖民地婦人に對する私の希望〉，《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8-14。

除了運用「民本主義」、「平民風氣」等當時政治新思潮的語彙討論家庭教育、殖民地婦女的行為舉止之外，婚姻中的兩性關係亦是當時代備受關注的議題。藤井夢露(ゆめぢ)與守屋三葉分別以不同的形式重新省視婚姻。藤井批判許多男性完全無視家庭的神聖、愛、慰安，結婚只是想要有個家內打雜、性愛的對象。她藉愛倫凱(Ellen Key, 1849-1926)等西方女權運動者的主張，強調婚姻關係中的愛情，以及擺脫奴隸式的束縛等。文末更論及因婦女解放運動，女性們已從因襲中覺醒，高喊從「戀愛到事業」，強調婦人亦有在世間奮鬥的責任。⁵²瑞典思想家愛倫凱的《戀愛與結婚》(*Love and Marriage*)於1913-1914間被介紹到日本，其論述包含戀愛的自由、離婚的自由、母性的尊重等，然而在日本最普遍接受的是關於戀愛自由的部分。⁵³藤井的文章一方面承襲愛倫凱的思想，強調婚姻中的愛情，但展開的論述卻又不僅限於女性與婚姻的關係，而是轉而強調跨出家庭，與社會聯結。藤井的身分背景不明，但從雜誌上有限的線索可知其為在東京的女性，曾參加「新女性」的團體，無法滿足於「過去賢妻良母」的立場鮮明。藤井在《婦人與家庭》上另有撰文談女性的集會，她認為女性團體屢屢消失，往往是來自女性自身的不理解與偏見，「未退之殼」使得日本女性無法成為「新女性」，她進而期待女性獨自的諒解，以及穩健團體的

⁵² 藤井ゆめぢ，〈斯くの如き男に掛るな 忌むべき近代結婚の新傾向〉，《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26-29。

⁵³ 井上輝子，〈恋愛觀と結婚觀の系譜〉，收入総合女性史研究会編，《日本女性史論集》，第4冊，婚姻と女性(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221-238。1920年代在《臺灣民報》上的許多討論也都圍繞著戀愛自由、婚姻自主性。關於民報上的論述，以及臺灣人婚姻樣式的變容，參見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頁185-238。

永續。⁵⁴身為日本女權運動參與者的藤井，為何會撰文於《婦人與家庭》，很可能與小島草光在日本的人際網絡有關，或者其自身擁有臺灣經驗。無論何者，我們可以看到傳入日本的女性解放運動思想，經過吸收後再次透過日本女權運動者之手輸出至殖民地，同時加入了在日本實踐經驗的反省，殖民地的女性也成為被啟蒙的對象。

文學士守屋三葉則透過逝世妻子的日誌，反省過去的婚姻生活。他同樣批判以男性為中心的家庭生活與兩性關係，同時，描繪妻子顯露在日記中不為人知的一面——擁有清晰的主張、看法，並抱持明確的家庭觀與理想生活；在重新理解妻子後，感嘆這樣的妻子卻為了丈夫過著犧牲自我的生活。守屋在文末寫道：「我現在正致力於男子的改造，若再進入丈夫生活的話，期待看到面目一新的自己」。⁵⁵行文中一方面闡釋女性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兼具感性與理性的形象，一方面推廣家庭中平等的兩性關係。

從小島的文章，到藤井、守屋的論述，雖然各自有著不同的重點，但交集、共有的概念是，女人是具有獨立人格的個體，在「家中」應有「平等」的地位。但這個交集共有的概念，既可能往打破日本傳統家族制度的方向發展，也可能與官方的「賢妻良母」方針不違背地共存。其中，只有藤井稍稍提到家以外的場域。

不過，在創刊號上，也明確出現鼓勵女性跨出「家」的主張。《臺灣日日新報》記者久保島天麗撰文論「婦女的社會化」，⁵⁶指出歐戰

⁵⁴ 藤井ゆめぢ，〈女性の會合に就いて〉，《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43-45。

⁵⁵ 守屋三葉，〈逝きし我愛妻の日誌を辿りゆきて〉，《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47-51。

⁵⁶ 久保島天麗為早稻田大學出身，推測約於1918年底或1919年初渡臺，擔任《臺灣日日新報》記者，負責經濟欄。1920年曾組織「臺灣大學期成同

後，各國婦人活躍於職場，而日本職業婦女的增加卻遠不及歐美諸國，其根本原因在於家族制度。他直指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不但使婦人的活動受限，亦不利於女性的教育與社會化，以致認為女性就業是一種恥辱；女子無職業、不事生產的狀況也影響國家的生產力，相對地，英國立憲政治發達的原因之一，與婦人的社會化有關。⁵⁷換言之，久保島批判日本傳統家族制度加諸女性的束縛，並鼓勵女性就業，甚至給予女性參與政治正面的評價。儘管主張的背後具有國家發展之考量，但女性已不再只是「賢妻良母」的角色，其活動場域亦不限於家庭，或透過家庭與國家連結，而是鼓勵女性跨足職場、參與社會。此外，北野里子的散文〈我也是女人嗎〉，⁵⁸以自言自語叨絮的筆法，反思什麼是

盟會」。1921年5月中，因將赴美進入波士頓大學而辭去臺日社工作，離臺返日。編有《臺灣經濟政策論》(臺北：臺灣之經濟社，1920)、《臺灣大學設置論》(臺北：臺灣大學期成同盟會，1920)。其相關經歷參見：久保島天麗，〈國家の本質〉，《臺灣警察協會雜誌》，48(臺北，1921.5)，頁57-60。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頁32-35。李恆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14：1(神戸，2006.10)，頁45-54。

⁵⁷ 久保島天麗，〈婦人の社會化を論ず〉，《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52-53。

⁵⁸ 北野里子的生平不明，曾在《婦人與家庭》上發表新詩與短歌賞析，從詩作判斷居住於臺灣。此外，從散文〈海與人〉可知其在渡臺前曾與「自由詩社」的詩人三富朽葉(1889-1917)、今井白楊(1889-1917)等人有往來。「自由詩社」為提倡口語自由詩的社團。參見：北野里子，〈春待つ宿〉，《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54-56；〈心の底の叫びを〉，《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42；〈海與人〉，《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52-56；〈誕生の国〉，《婦人と家庭》，2：11(臺北，1920.11)，頁43。關於自由詩社，參見：加藤介春，〈早稻田詩社及び自由詩社〉，收入山本三生等編纂，《日本文學講座》，第9卷，新詩

女人、妻子，以及與家庭的關係。文中的許多字句，都清楚地將矛頭指向傳統的家庭制度、婚姻制度，及其加諸女性的種種束縛與壓迫，並批判在此一制度下，女性被視為工具，個體的生命被忽視。⁵⁹即便在充滿「新時代」氛圍的創刊號中，這兩篇文章仍顯得極具批判性，也是對官方賢妻良母方針的衝撞與詰問。

如果我們重新整理上述不同關心的論述，可以看到兩個層次的女性論述。一是基於尊重女性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人」，在此延長線上論兩性之間的平等，重新改造家庭中的關係，包含民本主義的帶入、強調基於戀愛的婚姻等。另一層次，同樣基於平等的概念，但關於女性的論述，已跨出家庭的領域，較接近打破家族制度、追求自我之「新女性」的光譜。第一層次的論述可以往第二層次的論述發展，但也可能僅限於家庭的範疇。在第一層次中，支撐女性改造、家庭改造的概念，包含了戀愛自由、平等的兩性關係、女性的自我人格等等。這些來自西方自由主義女權運動者的概念，在 1910 年代中晚期即已被翻譯、介紹到日本。可以說，創刊號的論者們吸收這些概念，並在殖民地發行的婦女雜誌上推展宣揚。

上述的這些文章，都顯示了《婦人與家庭》的創刊號，回應了歐戰以後的新時代風氣，包含民本主義、打破階級界線，以及嘗試擺脫傳統束縛等新女性的思潮，同時也有著對賢妻良母主義的衝撞。一次世界大戰後瀰漫的新思潮，可以說是這些篇章背後蠢蠢欲動的伏流，

文學篇(東京：改造社，1933)，頁 309-313。

⁵⁹ 北野里子，〈私も女だろうか〉，《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60-63。例如，北野寫道：「丈夫稱我為妻子，小孩叫我為媽媽，母親是對一部分女人的尊稱，何謂妻子，是可以信賴的下女？……創造後繼者的道具……」；「男子有國家，有社會，有事業，更有世界……然而女人……」等等。

似乎為「創刊號」帶來了耳目一新、乘著時代之風的印象，也呼應了創刊詞中「時代的需求」、「婦人覺醒」等創刊背景。

(二) 創刊號之後：微弱的「新女性」之聲

若逐一翻閱現存的十二期雜誌，會發現洋溢著新時代精神的文章在創刊號之後數量逐漸減少，取而代之的是與之攻防的聲音(後述)。不過，在「新思潮」的磁場中反思傳統家族制度、討論女權的文章仍陸續可見，儘管為數不多，但一些論者的論述也開始拓展、深化。

在創刊號中論「婦人的社會化」的久保島天麗，之後仍繼續在該誌中撰文批評日本傳統家制度對女性社會化帶來的負面影響。〈女子同情錄〉一文，同樣認為家族制度導致日本女性的社會待遇低於世界各國，是限制女性社會化的結構性問題。但久保島並未主張打破家族制度，他認為「婦人全然將家庭置之度外是不可能的」，僅強調女性的自覺，以及期待社會對女性的理解，並主張提高女性在家庭、社會上的地位與待遇。⁶⁰此外，久保島也撰文介紹當時社會上流行的各種新思潮，如民主、普通選舉、婦人運動——包含教育平權、職業平權、法律平權、地位平等等。⁶¹

若參照久保島約當於同一時期發表在其他雜誌上的文章，可以更清楚一窺其思想的光譜。1919年底，他在《實業之臺灣》上撰寫討論社會問題的劇本〈光輝〉。主角為一位大學畢業生，為了解救世間的勞動者，進入工廠成為職工，並與同情勞動者的工廠主之女相遇，兩

⁶⁰ 久保島天麗，〈女子同情錄〉《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31-41、58。

⁶¹ 久保島天麗，〈婦人と時代思想〉《婦人と家庭》，2：5(臺北，1920.5)，頁9-13。

人皆致力於勞動環境與待遇之改善，劇終則以勞資雙方的大和解收場。透過主角口白，久保島傳達的訊息是：勞資雙方利害與共，唯有內部的和睦、拋棄對立的態度，才能達到社會的發展。⁶²此外，久保島還撰寫〈勞動問題的發生及其歸著點〉一文，指出勞動問題源於產業革命後產業組織變遷，利益分配卻未改變，導致資本家壟斷利益，文中並訴諸勞動運動的必要性與勞動者的自覺。⁶³這些文章顯示久保島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主義思想，但走的是溫和改革路線。1921年，久保島曾投書介紹關於國家本質的西方論說，並綜合這些學說，闡釋「國家是擁有天賦統治權之主體的統一個體」——依據多數個人所構成的「意志現象」，並為了共同且持續的目標而被統治。⁶⁴從久保島的這些投書內容，可以看到其受西方思潮影響甚巨，思想光譜也不同于保守、傳統的論述。儘管在《臺灣大學設立論》中，久保島的立論之一是基於日本勢力的擴張，⁶⁵可以說是一位國權主義者，但他的國家觀與其說是以天皇為中心的家族國家觀，不如說是帶有更多民本色彩的國家觀。筆者認為，這也是他批判日本傳統的家族制度，而不與國家觀衝突的原因。

對久保島而言，他視傳入日本的世界思潮為「改造思想」，並認為這些思想可以防止地位權力的濫用，並創造平等、合理的社會。⁶⁶這也

62 久保島天麗，〈(社會問題劇)「輝き」〉，《實業之臺灣》，119(臺北，1919.12)，頁38-43。久保島天麗，〈(社會問題劇)「輝き」〉，《實業之臺灣》，120(臺北，1920.1)，頁34-41。

63 久保島天麗，〈労働問題の發生と其歸著點〉，《臺法月報》，14：1(臺北，1920.1)，頁37-40。

64 久保島天麗，〈國家の本質〉，頁57-60。

65 李恆全，〈台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頁45-54。久保島天麗編，《臺灣大學設立論》。

66 久保島天麗，〈改造思想と權力〉，《新臺灣》，8：1(臺北，1921.1)，頁26-27。

是他在《婦人與家庭》的幾篇投書中，展現的是靠近「新思潮」的論述，但也如同他在勞動問題中採取的溫和路線，他對於婦女問題的解決方式，僅訴諸於社會地位的提高，而非對於家族制度的顛覆。

在創刊號中以散文反思何為女人的北野里子，其後亦有數篇作品陸續刊登於《婦人與家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文章是〈從男性中心的藝術到女性中心的藝術〉，探討藝術與性、心靈之間的關係。⁶⁷北野指出，隨著教育的進步、兩性的交往、女子職業的發展等，現代文明所帶來的社會狀態，顯著地拉近了男女兩性間的距離，也產生了新的中性，或擁有接近中性心靈者，甚至，也有人意識到，在心靈中居住著分裂的性。北野在行文中提及魏寧格(Otto Weininger, 1880-1903)的論點——每個人內在皆有幾分「男性」與「女性」的屬性，可以看到其論述的展開受到魏寧格的影響。⁶⁸不過，和魏寧格極度貶抑「女性」的思想不同，北野在魏寧格的基礎上發展出另一番詮釋。他以法國同性戀女畫家邦賀(Rosa Bonheur, 1822-1899)等人為例，提到「性」的分裂與葛藤，並認為在近代藝術家身上此一現象特別顯著，這對向來以男性為中心的藝術而言，是革命性的變遷期。他進而認為藝術的真諦是超越「性」，成為全人的；也因此，只知模仿過去男性中心樣式的女性藝術家們，必須先徹底地挖掘自己的「性」，從其深處掬取生命的泉源。文末則寫道，希望新的女性作家可以覺醒於自己的「性」，相對於過去男性中心的藝術，發展出滋味豐富、以女性為中心的藝術，如是，藝術逐漸變成「全人」的日子即將到來。

67 北野里子，〈男性中心の藝術から女性中心の藝術へ〉，《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29-31。

68 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著，蕭聿譯，《性與性格》(臺北：網路與書，2006)。

北野的這篇文章，已不再只是詰問、衝撞「賢妻良母」的規範，而是已超越、擺脫這樣的框架，進入另一層次的論述。其中，超越「性」的「全人」等觀點，可以看到和與謝野晶子的論點相似。⁶⁹不過，與謝野的〈何謂「女人應有的樣子」〉(1921.1)以及其他一些相似的論點，如〈關於性的特徵〉(1920.8)，〈男女分業思想的崩壞〉(1920.12)等，發表的時間都晚於北野。⁷⁰此外，關於生理與性靈上性的分裂，亦不在與謝野的論述中。足見北野論述的基礎並非來自與謝野，而是源自 1906 年後傳入日本的魏寧格之思想，⁷¹卻展開了獨自的詮釋——鼓勵女性跳脫過去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觀，忠於面對自己的性，並強調超越性別的「全人」。這番論述在殖民地輿論空間中也顯得相當獨特並具挑戰性。

除了上述兩位論者外，《婦人與家庭》上也出現來自日本本土「新女性」們的身影與論述，如與謝野晶子、原阿佐緒(1888-1969)的詩，陸續刊登在雜誌中。⁷²此外，時為早稻田大學教授的安部磯雄亦曾

⁶⁹ 王琬葶認為北野的這番論述，延續了與謝野晶子「女性中性化」的主張——與謝野認為「女人應有的樣子(女らしさ)」將女人束縛在生育與輔佐男性的分業上，限制了女性人格的發展，進而期許性別無差別化的社會，讓女性憑自由意志選擇作為一個「人」的生活。王琬葶，〈世界的聲響〉，頁 37-75。

⁷⁰ 與謝野晶子，〈性的特徵に就て〉、〈男女分業思想の崩壞〉、〈「女らしさ」とはなにか〉，收入與謝野晶子，《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 18 卷(東京：講談社，1980)，頁 130-132、212-218、253-264。

⁷¹ 魏寧格的著作《性與性格》(*Geschlecht und Charakter*)在 1906 年被翻譯介紹至日本，片山正雄譯為《男女與天才》，之後陸續改題再版，並持續為知識分子們所閱讀。關於魏寧格在日本的受容，參見：西野厚志，〈日本におけるヴァイニンガー受容——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作品を中心に〉，《學術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0(東京，2011.2)，頁 21-36。オットー・ワイニンゲル(Otto Weininger)著，片山正雄譯，《男女と天才》(東京：大日本図書，1906)。

⁷² 與謝野晶子，(無標題)，《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頁 24；

刊文其上。⁷³其中，與謝野晶子除了詩作之外，還有兩篇論說文。一是〈男女間的差別撤廢〉，主張廢除法律上、活動領域上女性與男性的差別，更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蹂躪女性生存權的法律」——《治安警察法》第五條。⁷⁴在這篇文章刊登前一年的1919年年底，平塚雷鳥、市川房枝(1893-1981)、奧むめお(1895-1997)等人籌組日本最初的婦人團體「新婦人協會」，在綱領中揭舉男女機會均等，並主張「改正治安警察法第五條」、「限制花柳病男子結婚」等，展開廣義的女性解放運動，並發行機關誌《女性同盟》(1920.3-1922.12)。⁷⁵與謝野晶子刊登在《婦人與家庭》上的文章，表現了與新婦人協會一致的立場，換言之，她將這樣的主張透過雜誌，介紹至殖民地臺灣。另一篇文章是〈婦人之力〉，讚許新婦人協會等新成立的婦女團體，內部能傾聽會員的意志，不但打破階級的迷信，且不仰賴男性或官僚的獎勵。與謝野直指過去的婦人會存在著支配者的特權，她露骨地批判愛國婦人會是一種英雄崇拜的迷信時代——多數女子仰賴一人的指導，致使女性認為自己是無能力、卑下的人；並提及友愛會女子部的失敗，也是因依賴男子的

〈早春〉，《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1；〈電燈〉，《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20-21。原阿左緒，〈鐸〉，《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6。

⁷³ 安部磯雄，〈結婚問題〉，《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18-23。不過這篇文章主要談論結婚問題，主張以戀愛為條件的婚姻，並基於人種改良、遺傳等見地，主張配偶的選擇應重視體格。

⁷⁴ 與謝野晶子，〈男女間の差別撤廢〉，《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4-5。《治安警察法》第五條禁止女性參加政黨結社、參加政治演說。

⁷⁵ 三鬼浩子，〈大正期の女性雜誌〉，頁3-53。米田佐代子，〈平塚らいてう〉，頁128-149。順帶一提，新婦人協會的機關誌《女性同盟》上的論述，主要集中在參政權獲得、《治安警察法》第五條撤廢與男女機會均等等議題上。

庇護。⁷⁶兩篇文章的最末，與謝野皆訴諸女性整體的結盟與力量的強化。

綜觀上述，可以看到《婦人與家庭》上一直陸續刊登、引介婦女解放的相關論述，從對傳統家族制、權力結構等舊制度、舊組織的批判，到鼓勵女性的社會化——包含地位待遇的提高與參政權，甚至是打破心靈性別框架的論述等等。其中也可以看到西方論述在日本受容後再次輸出至殖民地的軌跡。而持這些看法的論者，多為男性知識分子，以及日本本土的女權運動者，鮮少有殖民地臺灣的學校教師與教育關係者。此外，這些逸脫、衝撞賢妻良母規範的論述，在創刊號之後，其數量越發減少，批判的力道也顯得微弱。

四、另一種改造

(一) 從「家庭」到「國家」

《婦人與家庭》並非盡是上述企圖改造兩性不平等關係，打破傳統家族制度、衝撞賢妻良母體制的文章；對女性、家庭的改造，也存在著不同的方向。事實上，創刊號上已隱隱穿插了一道伏流，形成了這份雜誌的另一個重心，亦即，女性與國家的連結。

在創刊號上，臺北高等女學校校長秋吉音治發表〈婦人的活動必須以什麼為背景〉一文，指出國家現今最緊要的問題，是國力的維持與發展——如何能確保世界五大強國的地位，不僅靠男子，也需要老幼女子的自覺與決心。他批判當時的女性多為「個人主義」、「利己主義」者，強調今後應著眼於國家的共同團結。秋吉提出的具體作法

⁷⁶ 與謝野晶子，〈婦人の力〉，《婦人と家庭》，2：12（臺北，1920.12），頁8-10。

包含：婦人的改造從男子的根本改造開始，不應視女性為玩物；生活必須有哲學根底，拋棄纖弱是美的思想，強健身體（關係生育與生產力）；以衛生為要務改良衣食住等。⁷⁷在秋吉的論述中，可以看到與前述第一層次的論述共享同樣的概念——女性作為一個獨立個體，在此延長線上論兩性平等。但其論述並未往第二層次的論述——鼓勵女性的社會化發展。但秋吉的思考卻也不僅是停留在家庭的層面，而是將重心放在國家，無論在生育、經濟、日常生活的「改良」，都期待女性盡一己之力，其背後的思考與國力的維持與發展密切相關。

事實上，不僅是秋吉音治，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的論述，是《婦人與家庭》上反覆出現的旋律之一，並且，其比例在創刊號之後大幅增加。以第二卷第一期為例，便有數篇此一類型的文章。時為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同時也是總督府學務課長，在殖民地教育扮演重要角色的隈本繁吉，⁷⁸在該期雜誌上介紹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補充勞動力不足而成立的英、美婦女農業團。隈本詳細介紹其招募的方式、工作的內

⁷⁷ 秋吉音治，〈婦人の活動は何を背景とせなばならぬか——大火事が起こるぞ火元の用心を願ひます〉，《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15-21。

⁷⁸ 隈本繁吉，1873 年生，福岡人，渡臺前曾歷任文部省視學官、朝鮮總督府學務書記官、學務課長等等。1911 年渡臺，出任臺灣總督府學務課長，並兼任視學官及國語學校校長，1912 年學務課升格為學務部，隈本續任學務部長，即至 1920 年 6 月返回日本，在殖民地教育上扮演重要的角色。1919 年，隈本除了擔任學務部(課)長(6 月學務部縮編為學務課)、視學官之外，更出任高等商業學校校長，兼任臺北師範學校校長、在《婦人與家庭》上是以臺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校長的頭銜撰文。關於隈本的詳細經歷與教育構想，參見：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頁 224-304。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19，頁 67、155、附錄頁 16。

容，並強調這些女性的行動是基於獻身的精神，在國難之際和男性同樣為國奉獻，文末更期許日本國內「佔國民一半的婦人，在志操、體格、智識上的進展，並參與十分有意義的獻身、犧牲活動」。⁷⁹1917年英國農務省所設立的婦女農業團(Women's Land Army)是為了補充因戰爭而勞力陷於不足的農業勞動人口，在訓練的服務課程中也強調高尚的品行與為祖國的奉獻，然而不少女性志願加入則是緣於對制服的憧憬——女性們得以掙脫古老習俗的桎梏，獲得精神的解放。⁸⁰隈本在文中雖也提及她們穿著政府所配與的卡其色制服、長靴、男裝等，但強調的是充滿活力、敏捷執務，無關女性的解放或地位的提升，將農業團放在「愛國活動」中論述，並暗示女性對國家的獻身是一種「新思潮」。

總督府視學官平野象一(平野象二郎)則介紹西方雜誌上一篇以〈3C〉(church, children, cookery)為題，高喊英國婦人家庭中的日常革命，勸戒女性以家政、兒童為己任，守護家庭、為國家盡力的文章。平野藉此省視日本的女性，並主張種種「日常生活改造」。這些「改造」攸關國家的利益，包含擁有健康的身體才能生育健康的下一代；生育率影響國力的維持；戒除虛華奢侈的生活有利戰後經濟等。⁸¹在平野的思維中，女性也是國家發展過程中必須管理、控制的對象。

此外，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教諭廣松良臣，則是以「本島人」

79 隈本繁吉，〈英米に於ける婦人農業團——彼等の愛國的活動に感激せよ〉，《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10-16。

80 林田敏子，《戦う女、戦えない女——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のジェンダー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ィ》(京都：人文書院，2013)，頁94-104。

81 平野象一(平野象二郎)，〈婦人と日常生活の改造〉，《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44-47。在雜誌目次中的作者名為平野象一，內文處的作者則標示為平野象二郎。本名為平野象一，除了是總督府學務課的視學官之外，也是臺北師範學校的教授、公學校教科圖書審查委員會的常設委員。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1919，頁67、88、155。

婦女為其訴求的對象，提出「國家的家庭健全主義」。他認為，在國與國競爭激烈的時代，女性與男性擁有同樣的責任；過去女性治家是為了「家」，今後則是為了「國」。家庭是國家的細胞，因此，「本島人」的家庭應加以改良，讓作為國家細胞的家庭健全。其具體的作法包含：「國語」進入家庭、重視女子教育、強健身體，獎勵勤勞活動等。⁸²在廣松的論述中，女性依然被放置在家庭的場域，但透過家庭中的角色，使女性與國家連結。

從秋吉、隈本、平野到廣松，儘管論述的方式、強調的對象有所不同，但他們也都在談女性的「改造」，只是這個改造並非鼓勵女性追求自我，或社會地位的提升，而是直接獻身國家，或是透過家庭中的角色成為國家的助力。在這些論述中，女性成為國家動員的對象，也放在國家競爭發展的射程中。有趣的是，隈本繁吉和平野象二郎在論述的過程中，都援用西方的例子，來強調女性和國家的連結，似乎援用、介紹西方的動向與輿論本身，就意味了和新時代接軌。

(二) 對「新女性」的攻防：向「賢妻良母」的回歸

然而僅是嚷著民主，呼喊改造革新，究竟應該如何改造我國，如何建造文明，並沒有進一步顯示徹底的方針，僅是招來國民思想的混亂，而不知歸一之處。⁸³

這一段話，是前述平野象一在〈婦人與日常生活的改造〉一文中的文字，生動地反映了作為總督府視學官平野自身面對新時代思潮的心境，以及《婦人與家庭》上關於女性論述分歧的樣態。

⁸² 廣松良臣，〈本島婦人と家庭生活の改善は如何にすべき？〉，《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57-62。

⁸³ 平野象一(平野象二郎)，〈婦人と日常生活の改造〉，頁 44-47。

歷史學者鹿野政直指出，一次世界大戰後是日本思想界的激動期，人心嚮往著改造。1919年《改造》雜誌創刊，更加速了這樣的動向，「改造」成為當時的流行語。當時許多書籍以「改造」為名，《中央公論》上也充斥著「人生改造」、「社會改造」，《婦人公論》更策劃「由男性所見的女性改造」、「由女性所見的男性改造」等特集。⁸⁴這把「改造」之火也延燒至殖民地的雜誌上。

《婦人與家庭》從創刊號瀰漫新時代思潮的諸多論說，到隈本繁吉、平野象一、廣松良臣強調女性與國家的連結，無一不是在強調女性的改造、家庭的改造。然而，各論述意圖改造的方向卻極為不同，呈現呼喊著改造，卻眾聲喧嘩的現象。平野的這番話，暗示他無法無視新時代潮流帶來的種種「亂象」，他也高舉「改造」的新時代標語，面對崛起的「新思潮」進行攻防。

事實上，前述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的諸多論述，與官方女子教育方針「賢妻良母」的「正軌」有著密切的關係，除了是「另一方向的改造」之外，也是對雜誌上逸脫賢妻良母規範的論述進行「撥亂反正」，更是對新思潮的一種攻防。這些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之論述，可以以前述臺北高等女學校校長秋吉音治作為考察的對象。對照同一時期秋吉發表在其他雜誌上的文章，我們能描繪其女性相關論述更完整的輪廓，進而發現發表在《婦人與家庭》上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的論述，實則承襲了官方的「賢妻良母」方針。

秋吉在談女子教育時，曾呼籲世人重新反省「賢母」、「良妻」的內容，他不斷強調女性的德性、身體健康以及智力之重要，反對傳統家庭中順從良人、服侍姑舅等關係對女性人格的壓迫。他認為面對這樣的壓迫，必須重視女性是具有獨立人格者，主張在女子教育中鍛

⁸⁴ 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第27卷，大正デモクラシー，頁284-286。

鍊意志，並以培養強壯的體力來鞏固意志，以解決女性所面臨的壓迫。⁸⁵秋吉此處的論述與前述創刊號中其它篇乘著新時代之風，強調尊重女性人格的第一層次論述重疊。但論外來思想之際，秋吉卻又極力推崇教育敕語，認為在外來思潮不斷輸入之際，教育敕語對外統一了紛雜錯亂的國民思想。⁸⁶及至前述《婦人與家庭》創刊號上的文章，秋吉則強調女性諸多面向的「改良」，以維持國力的發展。

該如何理解秋吉這些紛亂、不連貫、看似先進卻又保守的言論？關於戰前的「賢妻良母」，秋枝蕭子指出，同樣的語彙背後之意義卻很多樣，所承載的女性觀也相當不同。例如，基於男尊女卑之儒教女性觀的「賢妻良母」，不同於奠基於西歐近代思想，人的自由、平等觀下的「賢妻良母」。此外，隨著甲午、日俄戰爭的勝利，教育敕語倡導的「忠君愛國」、「國威高揚」的教育也和「賢妻良母」教育結合。這種從內支撐天皇制國家基礎的家族制度——「內助之功的良妻」和「軍國的賢母」結合在一起的「賢妻良母主義教育」，成為 1899 年「高等女學校令」後設立的公私立女學校之教育理念，普及全國。將女性視為國家的一分子，也和傳統儒教的賢妻良母教育非常不同，是隨著國家主義強化下，將賢妻良母教育回收至「強化『家族國家』的教育」下之結果。⁸⁷

若重新整理秋吉散落在不同篇章中的論述，就會看到，秋吉雖然看似批判「賢妻良母」，但其批判的其實是傳統儒教思想中男尊女卑的「賢妻良母」。事實上，作為高等女學校校長的秋吉，對女子教育

85 秋吉音治，〈女子教育に対する感想〉，《臺灣教育》，204(臺北，1919.5)，頁 7-10。

86 秋吉音治，〈教育勅語と外來思想〉，《臺灣教育》，222(臺北，1920.10)，頁 9-11。

87 秋枝蕭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逸脱と回収〉，頁 451-480。

的看法仍在「賢妻良母」的框架下，而此處所謂的「賢妻良母」，指的是基於近代西方人類自由、平等觀的「賢妻良母」，並與國家主義結合，其最終目標為國力的發展與維持。換言之，秋吉發表在《婦人與家庭》創刊號上的文章，雖未直接使用「賢妻良母」的語彙，但其背後服膺的，卻是官方的賢妻良母論調。然而整篇文章包裝的卻是一種「改造」的氛圍，起始以「老幼男女齊心望向世界思潮」為小標，進而論述在各個層面如何進行女子、男子、家庭、生活的改造，文末則喊著必須打破舊慣，從陳腐的境界中覺醒。作為國民的女性被推至臺前，保守的「賢妻良母」則隱而不顯。

若回頭檢視上述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的幾位教育者的論述，會發現他們皆未使用「賢妻良母」的詞彙，僅在論述中不斷強調女性和國家的關係，但這樣的關係其實都不離官方女子教育方針「賢妻良母」的框架。換言之，他們都以新時代的流行語「改造」，包裝著實為「賢妻良母」的官方政策，對抗另一股新時代的潮流。

另一方面，對新女性的攻防，未必都強調與國家的連結，也未必都包裝著「改造」而隱晦不明。相對於前述許多教育者在新時代的氛圍中未明言「賢妻良母」，僅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不少總督府官員在《婦人與家庭》中則明白地否定「潮流」，並強調「賢妻良母」的教育方針，甚至否定男女平等。臺灣總督府編修官古山榮三郎在〈關於婦人問題〉一文中，開頭便寫道「最近世間的氛圍開始動搖，說什麼勞動問題、普選問題、婦女問題」，他接著否定男女同權、婦女參政權，指出「內助」、「育兒」是女性的兩大天職，女子教育的方針為賢妻良母主義，沒有改變的必要。他認為唯二需要改變的，是女性在家與學校中的地位——於家庭，有賴男性的反省，不應視女性為工具、玩物，才能改善婦人在家中的地位；於學校，必須使女子教育興盛，女性才能成為丈夫談話商量的對象，並教育子女，同時也透過

教育，改善體格。⁸⁸

古山的「賢妻良母」亦屬於受到西歐近代思想——立基於人的自由、平等立場上的「賢妻良母」，因而強調不應視女性為工具、玩物。但另一方面，在其論述中，女性追求的不是自我或在社會上的發展，其活動的場域仍被限定在家庭——受教育是為了教育子女，以及成為丈夫說話的對象。這般「賢妻良母」的內涵，除了與國力的發展相關外，也與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連動。日俄戰後，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住職分離的勞動型態以都市為中心逐漸擴張，為了讓男性無後顧之憂獻身產業，就必須養成能安心託付家政的「良妻」，以及養育有利於國家之兒童的「賢母」。家的全面管理營運、兒童的教育，以及丈夫商量談話的對象，成為中產階級專業主婦被要求擁有的能力。⁸⁹另一方面，古山雖未明言國家，但這樣的「賢妻良母」若向外延伸，同樣可以透過家庭——生育健康強健的下一代，培養未來的國民，而與國家連結。

另一方面，在《婦人與家庭》中，也可以看到少數光譜比官方「賢妻良母」教育更為保守的言論。例如，總督府內務局學務課長片山秀太郎認為，世界的運行有其指針、法則，「古往今來聖人君子之說，孝子節婦之行，皆是天地間的大真理大指針，即便異端者之說流行，一時掩蓋這些真價值，一旦妖雲散去，真如的實相便會清楚地映照」。⁹⁰片山除了提到日本建國之光輝外，還認為孔子之說有其透徹千古的義理，顯示其理想中的婦道，不只是官方的「賢妻良母」，

⁸⁸ 古山榮三郎，〈婦人問題に就いて〉，《婦人と家庭》，2：5（臺北，1920.5），頁 2-8。古山亦是臺北師範學校教授，公學校教科圖書審查委員會常設委員。

⁸⁹ 秋枝蕭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逸脱と回収〉，頁 451-480。

⁹⁰ 片山秀太郎，〈人道地に墜ちんとす〉，《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37-41、43。

還包含了儒教男尊女卑的「賢妻良母」。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古山和片山所說的「賢妻良母」之內涵不盡相同，但無疑地，他們撰文的脈絡中都有一個「敵人」——片山稱之為「異端」，古山說「賢妻良母主義，沒有改變的必要」。這個「敵人」的身影，在臺灣總督府視學官松井實(1892-?)的文章中越發清楚，他寫道：「女人就是女人，無法把女人變成男人」。他認為：現代婦人應有的自覺，不是參政權、夫婦同權等，而是婦人的天職——生養子女；除此之外，家庭勞動，也是另一個女性應有的「自覺」，若不瞭解這一點，談婦人參政、職業問題，都是不合理的。⁹¹在這裡可以看到，松井否定女性擁有和男性同等的權利，並將女性的活動範圍限定於家。只要逸脫「賢妻良母」的規範，嘗試走出家庭跨足社會，包含參政與就業，都是其攻防的對象。這除了與一次世界大戰後女性就業者不斷增加有關之外，也與前述「新女性」們在此時的動向——籌組新婦人協會展開女性解放運動密切相關。松井的文章，清晰可辨其攻防的對象，是當時關於女性參政權、男女平權等相關主張。

綜觀上述，可以看到片山、古山、松井等人的言論，其實都是對「新女性」相關論述的攻防，想將女性拉離女性解放的磁場，回歸「賢妻良母」的軌道。而其攻防的對象，包含了在言論場域的雜誌上逸脫賢妻良母軌道的輿論，以及在現實世界中，職業婦女與女權運動者們的動向。

事實上，《婦人與家庭》上還有數篇以兄長寫給妹妹形式的文章，或反對離鄉升學，或諄諄勸誘盡女兒、妻子的本分，以家庭、丈夫為

⁹¹ 松井實，〈婦人の自覺すべき二つの問題〉，《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 17-19。

中心，勿失溫順美德等等。⁹²這些書信形式的文章，其實也都是防堵年輕女性向「新女性」的傾斜。弔詭的是，他們也都強調要做一個新時代的女性。

前述圍繞著「賢妻良母」的論說，以兩種不同的方式現身，一是包裝著「改造」，實則為強調女性與國家連結的官方「賢妻良母」主義；一是直接高舉「賢妻良母」，正面與當時日本女權運動相關的論述對抗，嘗試將女性拉回賢妻良母的「正軌」。前者是官方論述在殖民地的宣傳，後者則是對「新女性」在殖民地擴散的防堵。在這些「賢妻良母」主義的延長線上，還存在著強調殖民地特殊情境的論述。

1920年1月，隈本繁吉以〈讓吾人的生活有意義〉為題，在臺北西本願寺別院演講，鼓吹個人生活的意義必須從家庭生活、風俗的改良做起，進而成為「擁有健康精神狀態的國民」。演講的內容分上、下兩篇刊在《婦人與家庭》。上篇講述日本擁有三千年歷史，天子是日本人崇敬的對象，明治以後歷經改革、戰爭，成為五大強國，作為國民必須有意義地生活，來到殖民地的日本人應扮演示範的角色，並致力於風俗、家庭的改良。⁹³下篇除了指出在共婚、共學等同化政策推進之際，日本人必須作為模範之外，更論及當時的世界大勢與應對方式。他形容全世界「流行著一種社會上、思想上的猛烈疾病」，以俄羅斯為中心，存在著過激主義，破壞世界的秩序；對此，臺灣人、朝鮮人需要早日成為健全的日本國民，從而擊退精神上、社會上的疾病，並期許「母

⁹² 水島八重，〈上京を望む愛する妹へ〉，《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20-23。廣瀬六郎(廣瀬陶醉)，〈嫁ぐ妹へ〉，《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47-49。田淵秋汀，〈寄宿舎の妹へ〉，《婦人と家庭》，2：4(臺北，1920.4)，頁39-41。

⁹³ 隈本繁吉，〈吾人の生活をして意義あらしめよ(上)〉，《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49-55。

國人」無論是家庭或個人，都必須成為模範，指導臺灣人。⁹⁴隈本將當時世界各地發生的運動、思潮視為洪水猛獸，主張將社會秩序收回至以天皇為中心的國家秩序中，同時，在同化政策、內地延長主義的方針下，將殖民地人納入國民的行列，並賦予「母國人」作為收編國民的領導者＝模範的角色。此一構圖同樣是官方賢妻良母主義的延伸，女性透過家庭成為國家動員的對象，背後更帶著「同化」殖民地臺灣人的意圖。

同樣強調殖民地特殊的情境，東京女學校校長棚橋絢子(1839-1939)以及共立女子職業學校校長，也是創立者的鳩山春子(1861-1938)，在《婦人與家庭》上，從賢妻良母的角度，論殖民地女性應有的樣子。棚橋、鳩山皆是日本著名的女子教育者，在 1900 年代日本商業婦人雜誌出現之時，即活躍其上，但撰文往往止於裁縫、洗衣等層面。⁹⁵當 1911 年《青鞜》刊行，「新女性」們嘗試從傳統的家制度與社會慣習中解放之時，鳩山與棚橋皆發出反對的保守之聲。鳩山一定程度鼓勵女性的自立與向上，但本質上亦屬於賢妻良母主義的信奉者，視《青鞜》及其關係者為危險思想的擁護者。棚橋亦是賢妻良母主義的女子教育家，1913 年東北帝國大學讓三名女性以本科生進入大學理學部就讀時，他認為應成為賢妻良母的日本婦人不需要大學教育，上大學的女性都是過了婚期的獨身者，或是「被新女性思想驅使的人」。⁹⁶

刊登在《婦人與家庭》上的〈東京女學校長棚橋絢子女史的殖民地婦人觀〉一文，為記者記載棚橋的談話，內容主要為女性應輔佐男性向殖民地移住之論調。棚橋認為在殖民地的婦女，應知曉日本的國

⁹⁴ 隈本繁吉，〈吾人の生活をして意義あらしめよ(下)〉，《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8-19。

⁹⁵ 金子幸子，〈近代日本女性論の系譜〉，頁 105。

⁹⁶ 秋枝蕭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逸脱と回収〉，頁 451-480。

情，擁有忍耐的特質，以擔任賢內助，並將日本的體面置於心上，訓育「土民」、普及皇化。⁹⁷1900年代左右，日本本土已出現一些論述，要求女性在對外的帝國經營上扮演一定的角色，這些論述出現在報刊上，以及女學校教師們的言論中。⁹⁸這些言論雖然獎勵女性「向外」移動、在殖民地開拓，但女性的角色仍處於「輔佐男性」的位置上，未脫「賢妻良母」的框架。棚橋的論調也與此一致，強調女性在帝國擴張之際作為「內助」、「輔佐」的角色，同時，又與前述隈本期待殖民地的日本女性擔任「模範」的期許重疊。

鳩山春子的〈對臺灣婦人的期望〉，則認為殖民地婦女太過奢華，應藉由讀書和技藝填滿空虛，並批判當時的政治社會問題帶來弊害。⁹⁹鳩山對殖民地風氣的批判，不難令人想起前述小島草光訪問臺中廳長，其對殖民地女性「怠惰放逸」、「無讀書觀念」、不知節約、充滿虛禮的種種批評。這些批評在當時頗為常見，也衍生出殖民地「家庭改造」的議題。

面對殖民地的日本女性，這些論者的論述基本上都基於官方女子教育的「賢妻良母」方針，並在此延長線上，強調殖民地的日本女性應協助男性向外開拓、扮演殖民地人民的模範，並透過自身的修養，

⁹⁷ 在京記者，〈東京女學校長棚橋絢子女史の植民地婦人觀〉，《婦人と家庭》，2：6(臺北，1920.6)，頁 25-28。

⁹⁸ 參見：加藤千香子，〈「帝国」日本における規範的女性像の形成——同時代の世界との関係から〉，收入早川紀代等編，《東アジアの国民国家形成とジェンダー——女性像をめぐる》(東京：青木書店，2007)，頁 64-86。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東京：田畑書店，1995)，頁 241-243。顏杏如，〈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史學報》，52(臺北，2013.12)，頁 243-294。

⁹⁹ 鳩山春子，〈臺灣の婦人に望む〉，《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 13-14。

杜絕殖民地的奢侈風氣。

透過以上的整理爬梳，會發現《婦人與家庭》雖然從創刊初始，乘著新時代之風訴諸婦人與家庭的改造，但隨著每期雜誌的出刊，批判、防堵「新女性」，試圖將女性們拉回「賢妻良母」軌道的論述，遠遠多於「新女性」、「新思潮」的論述。而執此觀點的論者幾乎都是殖民地的男性教師、教育官員，以及日本本土的女子教育家。《婦人與家庭》成為「新女性」與「賢妻良母」論述攻防的場域。

五、雜誌與讀者的關係

《婦人與家庭》雖然在發行、流通的性質上屬於商業發行，但圍繞著發行者與論撰文者的人際網絡，卻與官方教育界的社群密切結合。相對於代表臺灣人言論據點的《臺灣青年》(1920年7月創刊)以及其後身的《臺灣民報》，《婦人與家庭》可以說是少數在臺日人知識分子、女權運動者、女子教育家，以及多數殖民地教育官員言論匯聚的場域。面對這般具啟蒙性質、官方色彩濃厚，內容生硬的雜誌，其讀者群為何，讀者與雜誌的關係、互動又呈現何種樣貌？以下嘗試就當時女子教育的狀態、雜誌上所見的讀者投書等線索，嘗試勾勒可能的讀者範圍，以及雜誌與讀者之間的關係。

(一)《婦人與家庭》的讀者輪廓

婦女雜誌在日本的熱銷，與女子教育的普及、都市中間層的興起有密切的關係。日本在1890年頒布「高等女學校令」，1910年「高等女學校令及施行規則改正」，更推進一縣設置一高等女學校。1907年，小學校的女子就學率達96%，更進一步升學，進入高等女學校、

女子師範學校的女性超過 9 萬人。在女子教育政策的推展中，女性的讀書人口確實增加。¹⁰⁰此外，1910 年代到 1920 年代中葉，以職業婦女、女學生、都市中產家庭的主婦層為中心普及的婦人雜誌購讀習慣，逐漸擴大至下層的年輕女性，包括女工、女中等。而這些女性達一百多萬人。¹⁰¹隨著女性讀寫能力的急速上升，女性雜誌擁有廣大的讀者。

然而，在殖民地臺灣，1915 年以前初等教育學齡兒童的就學率，臺灣人女子僅有 1-2%；之後緩慢攀升，1920 年為 9.36%。《婦人與家庭》創刊的 1919 年，臺灣人女子的就學率是 7.36%，臺灣人男子是 32.42%，在臺日本人女子則是 95.02%。¹⁰²這些數據顯示，臺灣人的女子初等教育的狀況，完全無法與日本本土相提並論。儘管在 1919 年以後，在臺日本人女子就學率高達 95% 以上，但日本人人數在 1919 年僅佔臺灣全島人口的 4.13%。¹⁰³另一方面，中等教育的狀況又如何？1910 年代後半，臺灣社會的士紳階級對於女子教育的期望增高。1919 年公布的第一次《臺灣教育令》，確立了以臺灣人為對象的教育制度。普通教育分為公學校、高等普通學校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以女子為對象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修業年限為三年(較日本少一年)，並在本科之上增設一年師範科。¹⁰⁴1919 年度日本人就讀的高等女學校在學人數為

100 中 崑 邦，〈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婦人雑誌、その周辺——《婦人雑誌の夜明け》によせて〉，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婦人雑誌の夜明け》，頁 1-17。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頁 212。

101 永嶺重敏，《雑誌と読者の近代》，頁 162-188。

102 詳見：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頁 87-88、頁 286。

103 顏杏如，〈植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頁 29-30。

104 洪郁如，《近代台湾女性史》，頁 131-136。

791人，臺灣人就讀的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在學人數為322人。¹⁰⁵換言之，1919年《婦人與家庭》創刊之時，接受中等教育的女學生極為有限。和日本本土的女性雜誌不同，《婦人與家庭》的女性讀者非常有限，臺灣人女性更是微乎其微。在「讀者通信」中所見的讀者姓名亦多為日本人女性，可以推知在臺日本女性為主的高等女學校學生及主婦們是主要讀者，此外也不排除男性讀者存在的可能性。

戰後高等女學校的回憶顯示，日治初期開始，女性雜誌已是女學生們喜愛的讀物，校方也不太干涉。1905年臺灣總督府國語學校第三附屬高等女學校(臺北州立第一高等女學校前身)的宿舍完工，從第二學期開始，學生們可以住校。宿舍中原則上禁止報紙雜誌，但是校方默許攜入《女學世界》、《少女界》。¹⁰⁶帶進宿舍的雜誌，很可能在同儕之間傳閱。《婦人與家庭》上一則「讀者通信」也透露了雜誌在同儕間共讀、傳閱的樣態：

記者先生，這回出版的婦人雜誌在我們學校獲得了相當的好評，老師也說這樣的雜誌作為課外讀物非常好，我們現在組成了四人同盟，成為本誌的愛讀者，還請寄送。(臺北高野時子)¹⁰⁷

這則讀者來函透露，以日本女性為主的高等女學校學生是《婦人與家庭》的主要讀者群之一，學校教師甚至扮演了宣傳的角色。

¹⁰⁵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1)，頁114、116。統計調查時間為大正九年三月三十一日，顯示的是大正八年度(1919年4月1日至1920年3月31日)的狀況。

¹⁰⁶ 「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編集委員会編，《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藤澤：台北第一高等女学校同窓会みどり会，1998，臺灣協會藏)，頁118-119。

¹⁰⁷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92。

不過，在讀者來函中，也可以發現極少數臺灣女性的存在。在此羅列數則來自臺灣人女性的「讀者通信」：

婦人與家庭對我等本島人來說是很好的讀物，請為我等盡力。雖然我是本島人，但我認為內地式的無論什麼都很好，我穿和服、內地服通學。(臺北陳氏鶯香)¹⁰⁸

婦人與家庭對我們本島人來說實在是好讀物，請為我等盡力。我雖然是本島人，但有訂購兩三種雜誌，但都不怎麼合適，幸好婦人與家庭出刊，對我等來說實在是無上的讀物，非常高興。今後會成為本誌的愛讀者。(淡水張水[氏]彩月)¹⁰⁹

每號都有有益的記事，十分感謝。我會將本誌當成終其一生的朋友，請多指教。(臺北張氏阿順)¹¹⁰

張彩月除了「讀者通信」外，在「家庭笑話」欄中有一則極短篇的投稿。¹¹¹張阿順時為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的學生，曾投稿「本島童話」、「家庭笑話」專欄。¹¹²在第二卷第八號的雜誌中亦有「張氏阿順」的照片，身著漢服，身分為「臺灣教育會宣傳委員」，不排除為同一人的可能性。¹¹³臺灣人女性讀者寄給雜誌通信、投稿，顯示在此一時期，已有極少數接受日本教育的臺灣女性開始訂閱雜誌。從引文中穿和

108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92。

109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86。

110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64-65。

111 張氏彩月，〈「家庭笑話」父様があつたの〉《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37。

112 張氏阿順，〈「本島童話」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34-37；〈「家庭笑話」令尊〉，《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40-41；〈「家庭笑話」滑稽な詩人〉，《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41。照片中另有一位臺灣人女性吳阿銀，同樣身著漢服。

113 〈口繪〉，《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無頁碼。

服、上學、訂閱雜誌等行為，可以推知他們出身於具相當經濟能力的家庭，在文化上或積極同化於日本，或熱衷於吸收新知。不過，臺灣人女性姓名的出現是「讀者通信」中的異數。從投稿者、贊助者、讀者來函，以及雜誌內容來看，讀者幾乎以在臺日本女性、在臺日本人男性知識分子為主，只有極少數臺灣人的身影。雖然《婦人與家庭》上偶爾也刊登一些臺灣人家庭的照片，不過這些照片的主角，幾乎都是紳商，或接受新式教育，積極同化於日本的家庭。例如曾任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與顏雲年(1874-1923)合資經營採礦事業的簡阿牛(1882-1923)、大嵙崁紳商王式璋(1862-1931)的家庭照，¹¹⁴以及淡水公學校教諭吳國治(1896?-?)的神前結婚照。¹¹⁵這些線索也提示了《婦人與家庭》與臺灣人社會之間的關係——以極少數的紳商家庭、積極同化於日本，與官方關係良好的上層社會之家庭為主。

從吉川注意到婦人雜誌大量輸入殖民地的現象，以及殖民地擁有閱讀日文能力的女性人口比例兩相對照來看，《婦人與家庭》與日本輸入的商業婦女雜誌不同，並未擁有廣大而堅實的讀者群，這恐怕也是《婦人與家庭》之後屢屢轉換經營者，1925年之後無疾而終的原因之一。《婦人與家庭》的誕生，與其說是殖民地本身的需求，不如說是受到日本商業雜誌輸入的影響，在其刺激下誕生的女性雜誌。然而在發行的過程中，一方面模仿輸入的女性雜誌，一方面也嘗試做出區

114 (插圖)，《婦人と家庭》，2：6(臺北，1920.6)，頁19。(插圖)，《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8。關於簡阿牛生平，另參見「簡阿牛」，《線上臺灣歷史辭典》，<http://140.112.113.3/Doth/Article.aspx?4483>^簡阿牛，擷取日期：2019年5月10日。

115 吳國治，1915年國語學校師範部畢業後，進入淡水公學校任教，其結婚的對象朱月孃為基隆實業家朱祿的長女。離開任職五年的淡水公學校後，進入大永興業株式會社，後又任林熊徵秘書。(〈神前結婚〉，《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87。林進發，《台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頁80。

別，強調以臺灣為中心來凸顯差異。在這樣的情況下，《婦人與家庭》預設的讀者群不僅僅是「本島在住內地婦人及其家庭」，還包含「本島婦人」，亦即臺灣人女性。然而，從上述女性就學率的狀況，實際的讀者以日本人為主，臺灣人女性極為有限。

(二) 參與式書寫的出現

日本女性雜誌從 1880、1890 年代就已設有短歌、詩、作文等「投稿欄」，這也是讀者得以在雜誌上積極表現自我的空間，進入 1900 年代後半，博文館等商業雜誌除了「投稿欄」之外，更出現了「讀者欄」。¹¹⁶「投稿欄」、「讀者欄」加強了編輯者和讀者之間，以及讀者和讀者之間的紐帶。¹¹⁷儘管《婦人與家庭》在內容上論說的比例偏高，但作為一部商業雜誌，試圖確保讀者的忠誠度，拉近與讀者的距離之努力明顯可見，在專欄的設計上也多模仿日本輸入的女性商業雜誌。在創刊號上便預告從次號開始設「誌友通訊(誌友たより)」、「人生境遇商量(身の上相談)」、「化粧法問答」，並刊登廣告，懸賞募集小說、短文。這些欄位常見於當時的日本商業女性雜誌，顯見《婦人與家庭》

¹¹⁶ 浜崎広，《女性誌の源流——女の雑誌、かく生まれ、かく競い、かく死せり》(東京：株式会社出版ニュース社，2004)，頁 373-398。「讀者欄」常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如「讀者俱樂部」、「誌友俱樂部」、「讀者通信」等等。

¹¹⁷ 今田繪里香曾討論 1930 年代以後，少女雜誌上編輯者和讀者之間所形成的親密關係，以及讀者之間所形成的社群網絡。木村涼子則指出 1920 年代後半的《主婦之友》具有「誌友」意識(愛讀者的集團意識)——共有價值觀、同樣閱讀經驗的連帶感，並透過演講會、茶話會等等各種活動，將讀者組織化。今田繪里香，《「少女」の社会史》(東京：勁草書房，2007)，頁 135-187。木村涼子，《「主婦」の誕生——婦人雜誌と女性たち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頁 84-104。

倣效其元素。其中，「人生境遇商量」專欄的原型最早出現在《女學雜誌》，之後常見於 1910 年代中葉以後的女性雜誌及報刊上。¹¹⁸專欄中出現的煩惱多與結婚、就業、家庭等女性日常生活、生涯抉擇密切相關，拉近了雜誌與讀者之間的距離。「誌友通訊」、懸賞募集等設計、安排，也使得《婦人與家庭》與讀者的關係不僅僅是單向的發信，傳遞，而出現參與、互動關係。

不過，《婦人與家庭》之讀者對雜誌的參與，其書寫的範圍仍在出版者設定的基本框架之內。以創刊號而言，懸賞募集小說要求「以家庭為中心，具社會的色彩」，這樣的設定與前述顧問小島草光的女性觀相近。此外，「新年文藝募集」則設定以下的主題：(一)如果我是男人會做什麼、(二)童話及傳說、(三)短歌、童謠、俳句、家庭笑話。¹¹⁹主題(一)顯示了對新時代的回應和強調男女平等的意圖。主題(二)要求「以本島為背景」，呼應了發刊辭中「以殖民地為中心、為背景的特種婦人雜誌」之自我定位。雜誌從第二卷第一號起，即開始刊登上述主題的讀者投稿，而這些投稿都相當具有「新時代」的意識與氣魄。例如「若我是男性」的主題，回應內容包含了：從事旅行、運動、體操等活動；甘於惡衣惡食，從事各種運動，為日本帝國、世界人類盡力；設立內職學校，讓不事生產的「內地人」及「本島人」子女

118 《女學雜誌》自三十五到四十二號(1886年)出現了是「いえのとも」的專欄，是婦人雜誌中最早的「人生境遇商量」，包含了家事、育兒、教育相關的問題與商量，人生境遇商量則佔了三分之一。最早明確使用「人生境遇商量(身の上相談)」名稱的婦女雜誌則是 1914 年創刊的《婦人週報》。參見：齋藤美穗，〈婦人雜誌における身の上相談〉，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大正期の女性雜誌》，頁 55-87。岩見代照監修，《「婦人雜誌」がつくる大正・昭和の女性像》，第 1 卷，恋愛、結婚 1(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頁 vi-xi。

119 〈懸賞小説募集〉，《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85。

有所自覺，致力於國家的生產事業等等。¹²⁰這些回答，基本上皆符合雜誌上知識分子、教育者的主張與論述，但卻以女性自身的角度發聲，不同於論說的生硬文字，以更貼近女性自身心境的形式呈現。

《婦人與家庭》第二卷第四期更規劃了「職業婦人」專號，除了總督府官僚、記者的論說、報導之外，還刊有「職業婦人之聲」，來自裁縫、教師、電話交換手、打字員、產婆等各行各業的職業婦人，描述自身職業的內容、驕傲、心酸，或對大眾提出呼籲。¹²¹除了懸賞募集的主題之外，雜誌也設有專屬讀者投書的「婦人論壇」。「婦人論壇」的內容多訴諸生活方式的改善或理想社會的樣貌，如提倡廢除日本服、主張撤廢各種不平等、強調尊重自由意志等。¹²²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到，讀者與雜誌的關係並非完全被動的、單向的閱讀與接受，而是參與式的，讀者也可能成為撰稿者，抒發一己之聲。只是，什麼樣的聲音會被雜誌編輯青睞、採納、刊登，仍關係了雜誌的路線。不難發現，這些投稿的內容多傾向強調新時代風氣中的平等、自由，以及女性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換言之，這些主題的設定，使得雜誌發行方欲傳遞的特定訊息，透過讀者的投稿而以另一種方式重述、強化，同時，又加入了不同於官方的色彩，以更貼近女性心聲，更具女性自我主體性的形式展現。

¹²⁰ 伊藤鶴子等，〈私が男だったら何をするか〉，《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77-79。

¹²¹ 〈職業婦人の声〉，《婦人と家庭》，2：4(臺北，1920.4)，頁 18-28。

¹²² 松本恵子，〈(讀者論壇)日本服に就いて〉，《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35-36。高瀬愛，〈(婦人論壇)私の理想する社會〉，《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44-45。村上茂代，〈(婦人論壇)横暴な夫に對して〉，《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28-29。

(三) 殖民地的「讀者共同體」

除了文藝募集、婦人論壇等「投稿欄」之外，「讀者通訊」欄的開設，也加深了雜誌和讀者之間的聯結、互動關係。從第二卷第一期開始幾乎每號皆刊登「讀者通信」或「誌友通信」，這些讀者的聲音多為對雜誌的支持、讚美和期待之聲，諸如「衷心感謝臺灣特有的婦人雜誌誕生」、「內容和外觀都好到讓人不覺得是在臺灣出版的雜誌」、「初次得知有在臺灣誕生的婦人雜誌，我的喜悅難以言喻，今後我會將雜誌視為師友，成為永久的愛讀者之一」等等。¹²³《婦人與家庭》在創刊號的封面印著「在臺灣誕生的婦人雜誌」，強調自己的定位，以及與日本輸入的女性雜誌之差異，《婦人與家庭》的訂閱者也屢屢強調對於「臺灣誕生的婦人雜誌」之感動，以及一種「屬於我們的雜誌」的興奮之情。

在第二卷第二號的「讀者通信」中，更有讀者提議，希望《婦人與家庭》能為讀者舉辦婦人會，以促進婦人的覺醒。此一提議引起了相當的迴響，在之後數期的「讀者通信」陸續有許多讀者附議，甚至提出更具體的方法，如舉辦婦人大會或演講會等等。而雜誌編輯也給予積極正向的回應，如「意外地從各方面獲得婦人大會的迴響與聲援，實感欣喜，近日或許會有具體的發表」等。¹²⁴儘管最後大婦人會的提案並未實現，但從讀者熱絡的附議、迴響，可以看到《婦人與家庭》的「讀者意識」已在此時萌芽。值得注意的是，《婦人與家庭》的讀

123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92。〈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64-65。

124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86。〈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64-65。〈誌友だよ〉，《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60-61。

者隱藏著一種無形的意識——相對於日本輸入女性雜誌所代表的「日本內地」，誕生於殖民地的《婦人與家庭》則意味著自身所處的殖民地臺灣之空間，也由此畫出了讀者「我們」。

「讀者通信」不僅加深了讀者和雜誌之間的關係，也開啟了讀者和讀者之間連結的可能性。一些讀者會在「讀者通信」留下對其他讀者或投稿者的問候，如：「臺南的山縣明子該不會是大阪人吧，請在本誌告訴我住所姓名(臺南 山根道子)」¹²⁵、「彰化的大森豐子好令人懷念，請交換訊息(臺北小夜子)」¹²⁶等等。「讀者通信」的園地，也成為讀者之間相互問候，結交朋友的空間，甚至逐漸形成「讀者共同體」的態勢。在雜誌上交友早在 1910 年代的日本女性文藝雜誌上就可以看到這種風氣，¹²⁷《婦人與家庭》的讀者們很可能在雜誌創刊前已接觸過這類雜誌的交友風氣。而在「讀者通信」中開啟的交友關係，則以日本為紐帶，並連結臺灣的空間。

讀者與雜誌，以及讀者與讀者之間的連結感，不僅展現在共存於殖民地臺灣的空間而畫出讀者「我們」之親近情感，也存在於面對新時代的「革命」情感。在「讀者通信」中不時可以看到一種擺脫因循古老，迎向新時代的意氣。例如：

現在是大正九年，女性可以做的事情也變多了，希望與各位一起靜靜思考我們女性的未來與現在。(臺北高野時子)¹²⁸

內地與其說是「婦人問題」，不如說正實踐著可稱之為「婦人實行運動」的熱烈宣傳，臺灣還不行。希望以草光先生為首，

125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92。

126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86。

127 金子幸代，〈「地方」と「都会」——「女子文壇」における投稿の研究〉，《近代文学研究》，24(東京，2007.1)，頁 75-88。

128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86。

一般同情婦人的各位奮起。(臺南山縣明子)¹²⁹

最近流行生活改善的語彙，也到了我們的生活必須改善的時代，請大家在雜誌上抒發意見(基隆柳澤俊子)¹³⁰

在這些訊息裡，讀者視雜誌為指導者，讀者之間則存在著一同面對新時代的革命情感，同樣也顯示了一種「改造」的意志。

在「讀者通信」中，偶有一些對封面不夠美觀的齟齬，諸如「內容充實，但封面不佳，……希望可以在給予好感這一點上更加努力」；「本誌二月號為何刊出那麼難看的封面，會左右婦人與家庭的價值」等。¹³¹雜誌封面觀感不佳似乎是讀者對雜誌唯一的不滿(參見圖 1)，卻少有讀者認為內容生硬難讀而期待更多娛樂性的內容等意見。在 1919-1920 年這個時間點，大眾化的《主婦之友》創刊僅兩年，《婦人俱樂部》則是 1920 年創刊，較《婦人與家庭》稍晚數月。換句話說，此時不少日本女性雜誌仍帶著啟蒙與道德性，通俗的性質尚不強烈，有能力購買日本輸入雜誌的殖民地讀者仍習慣於啟蒙、修養性質濃厚的內容。在這樣的狀況下，通俗的品味尚未被養成，也影響了《婦人與家庭》的讀者從雜誌中吸收知識的渴望更高於娛樂的期待。強調「新女性」、「改造」的時代氛圍，以及尚未全然大眾化、通俗化的日本輸入女性雜誌，使得《婦人與家庭》能以強調「誕生於臺灣」而在在臺日本人社會與極少數的臺灣女學生之間保有一定的讀者群。

129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64-65。

130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4(臺北，1920.4)，頁 72。

131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92。〈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64-65。

圖1 《婦人與家庭》與《婦人之友》封面對照



資料來源：皆藏於國立臺灣圖書館。

說明：上二圖由左至右依序為《婦人與家庭》創刊號(1919.12)、第二卷第一期(1920.1)封面。下二圖為同時期輸入臺灣，啟蒙性質較濃厚的日本商業女性雜誌《婦人之友》第十三卷第十二期(1919.12)與第十四卷第一期(1920.1)之封面，以為對照。

六、結語：圍繞著「女性」的角力戰

一次世界大戰後，乘著「改造」的潮流，並意圖瓜分日本印刷資本主義在臺灣日益擴張的版圖，雜誌《婦人與家庭》誕生，成為殖民地臺灣第一部商業女性雜誌。與《臺灣民報》系列不同，《婦人與家庭》並非基於明確的立場、主張，為了推廣特定理念而發行，而是乘著新時代之風，在雜誌商品化的脈絡下出現。女性與家庭的「改造」是發行者、撰稿者、讀者們關心所在的最大公約數，然而，改造的方向與內容卻不盡相同。

雜誌上的女性論述，一方面受到自由、平等等新思潮的影響，一方面仍無法擺脫官方賢妻良母方針的立場，並在這兩極之間不斷角力、攻防。但無論主張官方的「賢妻良母」，或受女權運動影響而主張追求自我的「新女性」，在雜誌上都不是整齊劃一的論述。或許可以形容這些論述如同一個光譜。光譜的最中間，是基於近代西方自由平等觀上的人格尊重、兩性平等。在此一價值上，進而詰問賢妻良母、批判家族制度、謀求女性在政治、社會上的平等，甚至嘗試打破性別框架者，屬於接近「新女性」的論述，位在光譜的一方。相反地，基於同樣的價值，但不向追求自我、社會化推進，而論家庭的改造，家庭內兩性關係的平等，透過家庭連結國家、帝國經營者，屬於官方的「賢妻良母」的論述，再向極端推進，還有男尊女卑的「賢妻良母」，位於光譜的另一端。而落在這光譜上不同點的諸多論述，皆有著對新時代、新思潮的回應，或吸收或抗拒，也有著朝向兩極拉扯的力量。只是，當以時間軸縱向地檢視雜誌的內容時，會發現，防堵新女性，試圖將女性們拉回「賢妻良母」這一方的力道，遠遠大於朝向「新女性」那一端的發展。

若嘗試「橫向」地掌握不同論述類型與社群之間的關係，可以發現，學校校長、教師等教育關係者，儘管秉持「賢妻良母」的方針，卻往往不明言「賢妻良母」，而是乘著「新時代」之風，論女性的「改造」與國家的連結。而總督府的官員，多明白地主張「賢妻良母」之女子教育方針，甚至否定男女平權，正面圍堵「新女性」在輿論與現實社會中的身影，這樣的傾向，在 1920 年的下半年越發地明顯。日本、殖民地的教育關係者，也針對殖民地的脈絡，強調臺灣人的同化與日本人模範的角色。另一方面，在「新女性」光譜的這端，有男性記者、女性論者與日本本土的女權運動者，然而他們的論述在創刊號中最多，之後逐漸減少，對於家族制度的批判、女性的社會化等議題，也以一种溫和的方式論述。

儘管論者們訴諸不同的目標，甚至是相反的兩極，然而在「新思潮」、「新時代」的氛圍下，他們都以「改造」之名，展開不同的「改造」論述；也常常引用西方的「新思潮」，包含保守主義論述，來對抗同樣自西方輸入的女性解放、女權運動之思想。《婦人與家庭》創造了一個輿論的空間，各立場的人在這裡發言，也互相角力。這些論述，呈現了當時在殖民地的媒體人、知識分子、官方教育者、關心女性議題者們的思想光譜。

另一方面，《婦人與家庭》作為商品，懸賞募集的專欄以及讀者來函的設計，不但拉近了與讀者之間的距離，也讓讀者參與式的書寫出現，更讓雜誌多了一些合聲與變奏——女性與社會、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女性發聲的主動形式再現，展現了女性面對新時代的意志與行動力，既覆述了官方的論調，卻又加入了自身詮釋的色彩。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婦人與家庭》上的論述看似多元並陳，但其實光譜的範圍十分有限——它幾乎是日本官方女子教育與民間女權運動「主流」論述的輸出與攻防。諸如《臺灣民報》中最为關注的

養女、聘金等婚姻習俗改革問題，以及基於民族的、階級立場的女性論述，或在日本曾出現的不婚論、離婚的自由、母性保護、社會主義等更多元色彩的女性相關論述，都不在《婦人與家庭》的視域中。若考慮《婦人與家庭》在創辦之初，強調內容將以臺灣為中心，則更會發現在這一點上僅是以在臺日本人社會為中心。雜誌的創辦人吉川精馬的商業取向與保守的女性觀，加上顧問小島草光關注「新女性」議題卻同時與教育界、官界保持關聯的人際網絡，暗示了《婦人與家庭》言論光譜的界線與範圍。雜誌的受眾以在臺日本人家庭為主，僅有少數接受新式教育、親近日本文化的臺灣女性成為可能的讀者，也讓《婦人與家庭》遠離臺灣社會的需求。即便讀者們透過懸賞募集加入了書寫的行列，但其發聲的內容仍難脫上述光譜的範圍。

1921年以後的《婦人與家庭》由於散佚，無法得見，不過從《臺灣日日新報》上的〈新刊介紹〉，斷續可見《婦人與家庭》的內容篇名，以及雜誌所做的各種改變，如：增加短歌、童謠、戲曲等文藝內容的篇幅；仿效日本本土的女性雜誌附贈別冊；增加實用生活資訊、記事；設兒童專頁等等。¹³²1923年甚至曾因「觸犯禁忌」而有十多頁在檢閱制度下被「割除」。¹³³這些現象顯示《婦人與家庭》似乎逐漸脫離濃厚的啟蒙性質，有朝向大眾化發展的態勢。不過，從前述發行情況不斷下滑的趨勢來看，這些大眾化的努力似乎未擲獲讀者青睞。不能忽視的還有，〈新刊介紹〉帶有廣告性質，為了吸引讀者購買，或許會因此而凸顯了大眾化的元素。此外，在看似大眾化的標題背後，實際上又乘載了哪些思想與意識，試圖加諸女性何種規範，意欲打造

132 〈新刊介紹〉，《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3月15日，第3版；1923年9月22日，第8版；1923年12月24日，第10版；1924年1月14日，第4版；1924年4月13日，第10版。

133 〈新刊介紹〉，《臺灣日日新報》，1923年8月19日，第6版。

何種理想的女性形象，則無法從片斷的目錄得知。日後若能發現這些散佚的史料，將得以更進一步補足女性商業雜誌在 1920 年代中葉以前，在殖民地發展軌跡中所遺落的拼圖。

以上，筆者梳理現存 1919 年到 1920 年《婦人與家庭》作為一部商業女性雜誌在殖民地發軔的樣態——兼具商業與啟蒙的性質；在一次世界大戰後新思潮湧現的變動時代中，揭舉「改造」卻為「新女性」與「賢妻良母」雙向攻防的複雜樣貌；其間顯現發行者、撰稿者嘗試左右殖民地女性的集體心性，以及圍繞著女性的角力戰。

(本文於 2019 年 8 月 8 日收稿；2020 年 4 月 9 日通過刊登)

*本文初稿曾以〈同為「改造」，各自表述——《婦人與家庭》中的女性論述(1919-1920)〉為題，發表於 2017 年 11 月 4 日東北亞歷史財團、東亞地區歷史學者交流溝通平臺、臺灣大學文學院歷史學系共同主辦之「體驗『世變』：從社會生活探索二十世紀初的東亞時代」學術研討會。會後，發表稿經由東亞地區歷史學者交流溝通平臺翻譯為韓文，收錄於未經審查的研討會論文集：朴敬石編，《동아시아의 '근대' 체감》(파주: 한울엠플러스, 2018)。而本文是根據 2017 年的會議論文，做了實質的修改而成。從發表到修改的過程，感謝研討會評論人陳姪媛教授、與會學者，以及《新史學》匿名審查人的諸多寶貴意見。此項研究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殖民地臺灣與婦女雜誌——形塑理想的殖民地女性、家庭與生活」(計畫編號：MOST 105-2410-H-002-087-MY2)之部分研究成果。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口繪〉，《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無頁碼。
- 〈目次〉，《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無頁碼。
- 〈版權頁〉，《婦人と家庭》，1：1(東京，1919.12)，頁 87。
- 〈版權頁〉，《婦人之友》，13：12(東京，1919.12)，頁 144。
- 〈版權頁〉，《第一教育》，3：6(臺北，1924)，頁 104。
- 〈近刊豫告〉，《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77。
- 〈封面〉，《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無頁碼。
- 〈封面〉，《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無頁碼。
- 〈封面〉，《婦人之友》，13：12(臺北，1919.12)，無頁碼。
- 〈封面〉，《婦人之友》，14：1(臺北，1920.1)，無頁碼。
- 〈神前結婚〉，《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 87。
- 〈插圖〉，《婦人と家庭》，2：6(臺北，1920.6)，頁 19。
- 〈插圖〉，《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 8。
- 〈誌友だより〉，《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 60-61。
- 〈職業婦人の声〉，《婦人と家庭》，2：4(臺北，1920.4)，頁 18-28。
- 〈懸賞小説募集〉，《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85。
-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92。
-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86。
-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64-65。
- 〈讀者の通信〉，《婦人と家庭》，2：4(臺北，1920.4)，頁 72。
-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
- 「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編集委員会編，《台北第一高女ものがたり》，藤澤：臺北第一高等女学校同窓会みどり会，1998，臺灣協會藏。
- オットー・ワイニンゲル(Otto Weininger)著，片山正雄譯，《男女と天才》，東京：大日本図書、1906。
- 久保島天麗(久保島留吉)編，《臺灣大學設立論》，臺北：臺灣大學期成同盟會，1920。

- 久保島天麗(久保島留吉)編，《臺灣經濟政策論》，臺北：臺灣之經濟社，1920。
- 久保島天麗，〈(社會問題劇)「輝き」〉，《實業之臺灣》，119(臺北，1919.12)，頁38-43。
- 久保島天麗，〈(社會問題劇)「輝き」〉，《實業之臺灣》，120(臺北，1920.1)，頁34-41。
- 久保島天麗，〈女子同情錄〉，《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31-41、58。
- 久保島天麗，〈改造思想と権力〉，《新臺灣》，8：1(臺北，1921.1)，頁26-27。
- 久保島天麗，〈國家の本質〉，《臺灣警察協會雜誌》，48(臺北，1921.5)，頁57-60。
- 久保島天麗，〈婦人と時代思想〉，《婦人と家庭》，2：5(臺北，1920.5)，頁9-13。
- 久保島天麗，〈婦人の社會化を論ず〉，《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52-53。
- 久保島天麗，〈労働問題の發生と其歸著點〉，《臺法月報》，14：1(臺北，1920.1)，頁37-40。
- 小島草光，〈大人本位の家庭から子供本位の家庭——子供を天性の儘に發育せしめよ〉，《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4-7。
- 小島草光，〈子供は何うして育てる注意したい若木の將來に就て〉，2：8(臺北，1920.9)，頁6-9。
- 小島草光，〈主婦の働きは何よりも先づ人間であれ〉，《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2-5。
- 小島草光，〈本誌關係の動機と私の婦人概観〉，《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82-84。
- 小島草光，〈服裝改善の根本方針に就て＝まづ婦人方の自覚に訴えたきこと〉，《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6-11。
- 小島草光，〈婦人方に讀んで頂きたい二問題〉，《婦人と家庭》，2：11(臺北，1920.11)，頁6-8。
- 小島草光，〈就學前の子供を持てる母親へ〉，《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2-5。
- 小島草光，〈最近感じた二三の事ども〉，《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2-6。
- 小島草光，《婦人の為に》，臺北：臺灣圖書刊行會，1920。
- 太田秀穂，〈殖民地婦人に對する私の希望〉，《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8-14。
- 水島八重，〈上京を望む愛する妹へ〉，《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20-23。

- 片山秀太郎，〈人道地に墜ちんとす〉，《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37-41、43。
- 加藤介春，〈早稻田詩社及び自由詩社〉，收入山本三生等編纂，《日本文學講座》，第 9 卷，新詩文學篇，東京：改造社，1933，頁 309-313。
- 北野里子，〈心の底の叫びを〉，《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42。
- 北野里子，〈男性中心の藝術から女性中心の藝術へ〉，《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29-31。
- 北野里子，〈私も女だろうか〉，《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60-63。
- 北野里子，〈春待つ宿〉，《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54-56。
- 北野里子，〈海と人〉，《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 52-56。
- 北野里子，〈誕生の国〉，《婦人と家庭》，2：11(臺北，1920.11)，頁 43。
- 古山榮三郎，〈婦人問題に就いて〉，《婦人と家庭》，2：5(臺北，1920.5)，頁 2-8。
- 平野象一(平野象二郎)，〈婦人と日常生活の改造〉，《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44-47。
- 本間生，〈男女教育平等論 女子教育茶話會にて〉，《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57-59。
- 田淵秋汀，〈寄宿舎の妹へ〉，《婦人と家庭》，2：4(臺北，1920.4)，頁 39-41。
- 伊藤鶴子等，〈私が男だったら何をするか〉，《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77-79。
- 吉川精馬，〈「婦人と家庭」發刊について〉，《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2-3。
- 吉川精馬，〈大に新聞雑誌を善用す可し〉，《實業之臺灣》，13：2，(臺北，1921.2)，頁 4-5。
- 吉川精馬，〈南進の機愈々熟す〉，《實業之臺灣》，13：8(臺北，1921.8)，頁 12-13。
- 吉川精馬，〈帝國の南方開發と臺灣〉，《實業之臺灣》，12：1(臺北，1921.12)，頁 6-9。
- 吉川精馬，〈戦後南支南洋と臺灣〉，臺北：實業之臺灣社出版部，1922。
- 吉川精馬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第二年第七號》，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7.7。
- 吉川精馬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新年號》，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8.1。
- 在京記者，〈東京女學校長棚橋絢子女史の植民地婦人觀〉，《婦人と家庭》，2：6(臺北，1920.6)，頁 25-28。
- 守屋三葉，〈逝きし我愛妻の日記を辿りゆきて〉，《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

頁 47-51。

安部磯雄，〈結婚問題〉，《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18-23。

羽賀銀松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大正五年 八月上の巻》，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6.8。

羽賀銀松編，《臺灣日日寫真畫報 大正五年 八月下の巻》，臺北：臺灣日日寫真畫報社，1916.9。

村上茂代，〈(婦人論壇)横暴な夫に對して〉，《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28-29。

岩崎潔治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

松井實，〈婦人の自覺すべき二つの問題〉，《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 17-19。

松本恵子，〈(讀者論壇)日本服に就いて〉，《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35-36。

林進發，《台灣人物評》，臺北：赤陽社，1929。

秋吉音治，〈女子教育に対する感想〉，《臺灣教育》，204(臺北，1919.5)，頁 7-10。

秋吉音治，〈婦人の活動は何を背景とせなばならぬか——大火事が起こるぞ火元の用心を願ひます〉，《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 15-21。

秋吉音治，〈教育勅語と外來思想〉，《臺灣教育》，222(臺北，1920.10)，頁 9-11。

原阿左緒，〈鐸〉，《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 6。

記者，〈臺灣子供世界社主催 お伽大會の記〉，《學友》，1：11(臺北，1919.11)，頁 12-13。

高瀬愛，〈(婦人論壇)私の理想する社會〉，《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44-45。

張氏阿順，〈「本島童話」鏡〉，《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34-37。

張氏阿順，〈「家庭笑話」令尊〉，《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40-41。

張氏阿順，〈「家庭笑話」滑稽な詩人〉，《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41。

張氏彩月，〈「家庭笑話」父様があつたの〉，《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37。

隈本繁吉，〈吾人の生活をして意義あらしめよ(上)〉，《婦人と家庭》，2：2(臺北，1920.2)，頁 49-55。

- 隈本繁吉，〈吾人の生活をして意義あらしめよ(下)〉，《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 8-19。
- 隈本繁吉，〈英米に於ける婦人農業團——彼等の愛国的活動に感激せよ〉，《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 10-16。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一)〉，《臺灣時報》，1935：2(臺北，1935.2)，頁 134-140。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二)〉，《臺灣時報》，1935：3(臺北，1935.3)，頁 101-106。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三)〉，《臺灣時報》，1935：4(臺北，1935.4)，頁 104-108、116。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四)〉，《臺灣時報》，1935：5(臺北，1935.5)，頁 118-127。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五)〉，《臺灣時報》，1935：6(臺北，1935.6)，頁 110-116。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六)〉，《臺灣時報》，1935：7(臺北，1935.7)，頁 140-144。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七)〉，《臺灣時報》，1935：10(臺北，1935.10)，頁 147-153。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八)〉，《臺灣時報》，1935：11(臺北，1935.11)，頁 120-124。
- 裏川大無，〈臺灣雜誌興亡史(九)〉，《臺灣時報》，1935：12(臺北，1935.12)，頁 139-143。
- 鳩山春子，〈臺灣の婦人に望む〉，《婦人と家庭》，2：8(臺北，1920.9)，頁 13-14。
- 臺灣總督府，《臺灣總督府職員錄》，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八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三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1。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九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四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2。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五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3。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一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六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4。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二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七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5。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三年臺灣總督府第二十八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6。
- 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編，《大正十四年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第二十九統計書》，臺北：臺灣總督府官房調查課，1927。
- 與謝野晶子，(無標題)，《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頁 24。

- 與謝野晶子，〈早春〉，《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1。
- 與謝野晶子，〈男女間の差別撤廢〉，《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4-5。
- 與謝野晶子，〈婦人の力〉，《婦人と家庭》，2：12(臺北，1920.12)，頁8-10。
- 與謝野晶子，〈電燈〉，《婦人と家庭》，2：7(臺北，1920.8)，頁20-21。
- 與謝野晶子，《定本與謝野晶子全集》，第18卷，東京：講談社，1980。
- 廣松良臣，〈本島婦人と家庭生活の改善は如何にすべき？〉，《婦人と家庭》，2：1(臺北，1920.1)，頁57-62。
- 廣瀬六郎(陶醉)，〈嫁ぐ妹へ〉，《婦人と家庭》，2：3(臺北，1920.3)，頁47-49。
- 藤井ゆめぢ，〈女性の會合に就いて〉，《婦人と家庭》，2：9(臺北，1920.10)，頁43-45。
- 藤井ゆめぢ，〈斯くの如き男に掛るな 忌むべき近代結婚の新傾向〉，《婦人と家庭》，1：1(臺北，1919.12)，頁26-29。

二、近人論著

- 三鬼浩子，〈大正期の女性雑誌——働く女の機關誌を中心に〉，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大正期の女性雑誌》，東京：大空社，1996初版；2016新裝普及版，頁3-53。
- 三鬼浩子，〈明治の婦人雑誌をたどる〉，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婦人雑誌の夜明け》，東京：大空社，1989初版；2016新裝普及版，頁3-102。
- 小山靜子，《良妻賢母という規範》，東京：勁草書房，1991。
- 中嶋邦，〈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婦人雑誌、その周辺——《婦人雑誌の夜明け》によせて〉，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会，《婦人雑誌の夜明け》，東京：大空社，1989初版；2016新裝普及版，頁1-17。
- 井上輝子，〈恋愛觀と結婚觀の系譜〉，收入総合女性史研究会編，《日本女性史論集》，第4冊，婚姻と女性，東京：吉川弘文館，1998，頁221-238。
- 今田絵里香，《「少女」の社会史》，東京：勁草書房，2007。
- 天野正子編著，《女子高等教育の座標》，東京：垣内出版，1986。
- 日本図書館情報学会用語辞典編集委員会編，《図書館情報学用語辞典(第4版)》，東京：丸善書店，2013。
- 木村涼子，《「主婦」の誕生——婦人雑誌と女性たち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0。

- 王琬葦，〈世界的聲響——日治時期臺灣女性雜誌的女性主義閱讀(1919-1939)〉，《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4(臺北，2014.6)，頁 37-75。
- 加藤千香子，〈「帝国」日本における規範的女性像の形成——同時代の世界との関係から〉，收入早川紀代等編，《東アジアの国民国家形成とジェンダー——女性像をめぐる》，東京：青木書店，2007，頁 64-86。
- 永嶺重敏，《雜誌と読者の近代》，東京：日本エディタースクール出版部，1997。
- 牟田和恵，《戦略としての家族——近代日本の国民国家形成と女性》，東京：新曜社，1996。
- 竹中信子，《植民地台湾の日本女性生活史》，東京：田畑書店，1995。
- 米田佐代子，《平塚らいてう——近代日本のデモクラシーとジェンダー》，東京：吉川弘文館，2002。
- 西野厚志，〈日本におけるヴァイニング受容——芥川龍之介・谷崎潤一郎作品を中心に〉，《學術研究(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編)》，60(東京，2011.2)，頁 21-36。
- 佐藤卓己，《『キング』の時代——国民大衆雑誌の公共性》，東京：岩波書店，2002。
- 吳明純，〈國策、機關誌與再現書寫——以《臺灣教育會雜誌》、《臺灣愛國婦人》、《新建設》為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 図書館問題研究会図書館用語委員会編，《図書館用語辞典》，東京：角川書店，1982。
- 李承機，〈台湾近代メディア史研究序説——植民地とメディア〉，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4。
- 李明水，《臺灣雜誌事業發展史》，臺中：臺灣省政府，1986。
- 李恆全，〈臺北帝国大学成立史に関する一考察〉，《神戸大学発達科学部研究紀要》14：1(神戸，2006.10)，頁 45-54。
- 岩見代照監修，《「婦人雑誌」がつくる大正・昭和の女性像》，第1巻，恋愛、結婚1，東京：ゆまに書房，2014。
- 林田敏子，《戦う女、戦えない女——第一次世界大戦期のジェンダーとセクシュアリティ》，京都：人文書院，2013。
- 金子幸子，《近代日本女性論の系譜》，東京：不二出版，1999。
- 金子幸代，〈「地方」と「都会」——「女子文壇」における投稿の研究〉，《近代文学研究》，24(東京，2007.1)，頁 75-88。
- 金原左門，《大正期の政党と国民——原敬内閣下の政治過程》，東京：塙書房，1973。
- 信夫清三郎，《大正デモクラシー史》，東京：日本評論社，1954。

- 柳書琴，〈通俗作為一種位置——《三六九小報》與1930年代臺灣的讀書市場〉，《中外文學》，33：7(臺北，2004.12)，頁17-55。
- 洪郁如，〈日本殖民統治與婦人團體——試論1904-1930年的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臺灣風物》，47：2(板橋，1997.6)，頁53-71。
- 洪郁如，《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
- 秋枝蕭子，〈「良妻賢母主義教育」の逸脱と回収——大正・昭和前期を中心に〉，收入奧田暁子編，《女と男の時空——日本女性史再考》，東京：藤原書店，2000，頁451-480。
- 徐聖凱，《日治時期臺北高等學校與菁英養成》，臺北：國立師範大學出版中心，2012。
- 浜崎広，《女性誌の源流——女の雑誌、かく生まれ、かく競い、かく死せり》，東京：株式会社出版ニュース社，2004。
- 張志樺，〈當臺灣開始談戀愛——日治時期戀愛論述〉，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5。
- 深谷昌志，《良妻賢母主義の教育》，名古屋：黎明書房，1998。
- 陳培豐，〈殖民地大眾的爭奪——〈送報伏〉・〈國王〉・〈水滸傳〉〉，《臺灣文學研究學報》，9(臺南，2009.10)，頁249-290。
- 陳培豐著，王興安、鳳氣至純平譯，《「同化」的同床異夢——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近代化與認同》，臺北：麥田，2006。
- 鹿野政直，《日本の歴史》，第27卷，大正デモクラシー，東京：小学館，1976。
- 游佩芸，《日治時期臺灣的兒童文化》，臺北：玉山社，2007。
-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7。
- 奧托·魏寧格(Otto Weininger)著，蕭聿譯，《性與性格》，臺北：網路與書，2006。
- 楊翠，《日據時期臺灣婦女解放運動——以《臺灣民報》為分析場域(1920-1932)》，臺北：時報文化，1993。
- 齋藤美穂，〈婦人雑誌における身の上相談〉，收入近代女性文化史研究會，《大正期の女性雑誌》，東京：大空社，1996初版；2016新裝普及版，頁55-87。
- 顏杏如，〈殖民地都市台北における日本人の生活文化——「空間」と「時間」における移植、変容〉，東京：東京大学大学院総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研究専攻博士論文，2009。
- 顏杏如，〈與帝國的腳步俱進——高橋鏡子的跨界、外地經驗與國家意識〉，《臺大歷

史學報》，52(臺北，2013.12)，頁 243-294。

藤井省三，《台湾文学この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

三、網路資源

「簡阿牛」，《線上臺灣歷史辭典》，<http://140.112.113.3/Doth/Article.aspx?4483>簡阿牛，擷取日期：2019年5月10日

國立臺灣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http://cis2.ntl.edu.tw/webpac/>，擷取日期：2020年3月10日。

Interpretations of Reform: The Publication and Discourses of the Commercial Women's Magazine *Women and Family* (Fujin to Katei) in Colonial Taiwan

Hsin-ju Ye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the publishing background, characteristics, and discourses about women seen in the commercial women's magazine *Women and Family* (Fujin to Katei), which began publication in colonial Taiwan in late 1919. This study focuses on such aspects of the magazine as media and as commodity, as well as on the influence that the social connections and networks of the publishers and writers had on the magazine. This reveals the norms and expectations applied to colonial women by the intertwining forces of colonial rule, the changing times, and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While *Women and Family* was published during the era of "women's awakening," it also had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steady growth of exported Japanese women's magazines to the colony. Influenced by the trends of the post-World War I era, the magazine was full of words like "equality," "reform," "awakening," and like, but their meanings varied. A small number of Japanese male journalists and female writers in Taiwan and women's rights supporters in mainland Japan criticized the Japanese family system and promoted women's socialization in the magazine. However, government educators upheld the norm of "wise wife

and good mother,” directly countering the rise of the “new woman.” Readers also contributed to the magazine, adding some choruses and variations to *Women and Family*. On the one hand, their remarks repeated the arguments and views put forth by the magazine, while at the same time they also revealed the goals and movements of women themselves in this new age. As the first women’s commercial magazine started in the colony, *Women and Family* illustrates the interweaving of women, society, and nation, revolving around women’s rights in the 1920’s, and highlights the roles of Japanese intellectuals in Taiwan, government education circles, and the small number of literate Japanese women.

Keywords: Japanese colonial era, women’s magazines, commercial publishing, wise wife and good mother, new woman